

153
52-37

新青年學習叢書



著者

毛澤東
劉少奇
斯大林
鄧初民
斯列波夫

論學習與修養

序

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毛澤東主席在晉綏幹部會議上講話，重申中國共產黨在當前歷史階段的總路線，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這是一條正確的革命路線。中國青年必須依據這條革命路線的指導原則，和人民大眾結合，尤其是要深入到工農大眾的羣裏，向工農學習，和大眾一致，然後才能完成中國當前的革命任務。

本書所編，都是有關中國青年學習與修養的重要文獻。無論共產黨員或知識青年，都可奉為經典，作為工作和生活的教條。這裏從知識分子的改造說起，說到學習方法和學習制度，最後論述在工作中的自我修養問題。每篇文字雖各自獨立，但是排列極有系統，可以在讀完本書以後，獲得正確而縱深的，關於學習與修養方面的真正的知識。

曹 達 一九四九年六月

目次

第一編 論知識分子

- 革命知識分子的改造……………毛澤東(一)
- 知識青年的自我改造……………周原冰(一一)
- 知識分子今天的任務……………(一六)
- 爭取·團結·改造·培養知識分子……………中共中原局(二二)

第二編 論學習方法

- 改造我們的學習……………毛澤東(二六)
- 論集體學習……………鄧初民(三五)
- 論學習方法……………林志石(四四)
- 集體學習的新方法……………柳維光(五五)

第三編 論自我修養

-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劉少奇(五九)
- 論自我批評……………斯大林(七六)
- 論工作的求實精神……………斯列波夫(八五)

革命知識分子的改造

現在有些糊塗觀念，在許多人中間流行着。例如關於什麼是理論家？什麼是知識分子？什麼是理論與實踐聯系等等。

我們首先要問，我們黨的理論水平究竟是高還是低的呢？近來馬列主義的書籍翻譯的多了，讀的也多了。這是很好的事。但是否就可以說我們黨的理論水平已經是提得很高了呢？確實，我們的理論水平是比過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國革命運動的豐富內容來說，理論戰線就非常之不相稱；二者比較起來，理論方面就顯得非常之低，非常之落後。一般說來，我們的理論還不能夠與革命實踐相平行，更不去說理論應該跑到實踐的前面去。我們還沒有把豐富的實際提高應有的理論程度。我們還沒有對革命實踐的一切問題，或重大問題，經過考察，上升到理論的階段。你們看，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我們究竟有多少人創造了算得稱為理論的理論，算得稱為科學形態的、週密的、而不是粗枝大葉的理論呢？特別在經濟理論方面，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從鴉片戰爭到現在，已經一百年了，但是還沒有產生合乎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的、真正科學的一本理論書。像中國經濟的問題，能不能說理論水平已經高了呢？能不能說我黨已經有了像樣的

經濟理論家呢？實在不能說。我們讀了許多馬列主義的書籍，能不能算是有了理論家呢？也不能的。因為馬列主義是馬恩列斯他們根據實際創造出來的理論，從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中抽出來的總結論。我們如果僅僅讀了它，但是沒有根據它來研究中國的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沒有創造出合乎中國實際需要的，自己的，特殊性的理論，我們就不能妄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如果我們身為中國共產黨員，卻對於中國問題熟視無睹，天天看，看不見，戴了眼鏡，還是看不見，看見了的只是書架子上的馬恩列斯的現成文獻，那末，我們在理論戰線上的成績就未免太壞了。如果我們只知背誦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或哲學，從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爛熟了（笑聲），但是完全不能應用，這樣是不是就算得一個馬列主義的理論家呢？大概不能算吧！這樣的「理論家」實在還是少一點好。假如一個人讀了一萬本馬恩列斯，每本又都讀了一千遍，以至於句句都背得，這還是不能算理論家的。我們所要的理論家，是什麼理論家呢？是要這樣的理論家：他們能依據馬恩列斯的立場、觀點、方法，正確地解釋歷史中與革命中所發生的實際問題，能够在中國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種種問題上，給予科學的解釋，給予理論的說明，我們要的是這樣的理論家。假如要作這樣的理論家，那就要能够真正領會馬列主義的實質，真正領會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並且應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學地去分析中國的實際問題，找出它的發展規律。這樣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理論家。

現在中央做了決定，號召我們的同志，學會應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思想方法，認真的研究中國的歷史，研究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對每一問題加以調查研究，然後創造出理論，這個責任是擔在我們的身上。

我們黨校不應該是死讀馬列主義條文的，而是要能夠首先精通它，然後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應用，現在作與用百分數計算成績，那麼，像讀一萬本書，每本讀了一千遍，但是完全不能應用，這究竟應該算多少分呢？我說一分也不算。（笑聲）但是，如果你能應用馬列主義觀點，說明一個二個實際問題、那就要受到稱讚，就算有了幾分成績。被你說明的東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績就越大。現在我們黨校，也要定這個規矩，看他讀了馬列主義以後怎樣看中國問題：有看得清楚的，有看得不清楚的，有會看的，有不會看的，這樣來分優劣，分好壞。

關於所謂「知識分子」的問題。因為我們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文化不發達，所以知識分子特別寶貴。中央又作了關於知識分子的決定，要爭取廣大的知識分子，只要他們是革命的，願意參加抗戰的，一概採取歡迎態度，這是很對的。因此知識分子就很光榮，土包子就吃不開。我們尊重知識分子，是完全應該的。沒有革命的知識分子，革命就不能勝利，但是我們曉得，有許多知識分子，他們自以為很有知識，大擺其知識架子，而不知道這種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礙他們前進的。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最無

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於是，有人說：「哈！你弄顛倒了，亂說一頓！」（笑聲）但是，同志們，你別着急，我講的多少有點道理。

甚麼是知識？從古至今，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鬥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鬥爭知識，民族鬥爭知識也包括在裏面。此外還有什麼知識呢？沒有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這兩種知識的結晶，哲學則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概括與總結，此外再沒有別的知識了。我們現在看看一些學生，看看那些從社會實際活動完全脫離關係的學校裏面出身的學生，他們的狀況是怎樣呢？一個從小學一直讀到大學畢業了，就有知識了，但是他們一不會耕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打仗，四不會辦事，這些都沒有幹過，這些實踐的知識一點也沒有，他們有的只是書本知識。這樣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個完全的知識分子呢？我以為很難，至少算得一個半知識分子，因為他們的知識還不完全。什麼是比較完全的知識呢？一切比較完全的知識都是由兩個階段構成的：第一階段是感性知識，第二階段是理性知識，理性知識是感性知識的高級發展階段。學生的書本知識，是什麼知識呢？假定他們的知識都是真理，也是他的前人總結生產鬥爭與階級鬥爭的經驗寫成的理論，不是他們自己親身得來的知識。他們接受這種知識是完全必要的，但須知道這種知識對於他們是倒轉的，是逆行的，是片面性的，是人家證明了而在他們還沒有證明的。他們須知學這種知識並不那末困難，甚至可以說是最容易的。像大司父煮飯就不容易，要把柴

米油鹽醬醋等件合起來，創造成吃的東西，這是並不容易的事情。弄得好吃更加不容易，西北菜社和我們家的大司父比較起來就有很大的區別。火大了要焦，鹽多了要苦，（笑聲）煮菜做飯真正是一門藝術。書本上的知識呢？如果只是讀死書，那末，只要你識得三五千字，學會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麼書，公家又給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搖頭擺腦的讀起來。書是不會走路的，也可以隨便把它打開或關起。這是世界上最容易辦的事情。這比大司父煮飯容易得多，比殺豬更容易。你要捉豬，豬會跑，（笑聲）殺它，它會叫，（笑聲）一本書擺在桌子上，既不會跑，又不會叫。（笑聲）隨你怎樣擺佈都可以。世界上那有這樣容易辦的事呀！所以我們勸那些只有書本知識但還沒有接觸實際的人，或者實際經驗尚少的人，應該明白自己的缺點，將自己的態度放謙虛一點。

有什麼辦法使半知識分子變為名符其實的知識分子呢？唯一的辦法，就是使一切僅有書本知識的人回到實際工作中去，變為實際工作者，而對於從事理論工作的人，則回到實際研究中去，這樣就可以達到目的。

我這樣說，難免有些人要發脾氣，他說：「照你這樣解釋，那麼馬克思也是一個半知識分子。」我說：是的，馬克思一不會殺豬，二不會耕田。但是他參加了革命運動，他又研究了商品。商品這個東西，幾百萬人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視無睹。只有馬克思他拿了商品這樣看，

那樣看，不像我們讀聯共（布）黨史這樣馬虎從事。他從商品實際發展中，做了分析工作，從普遍的存在的中，找出理論來，他研究了自然，研究了歷史，研究了無產階級革命，創造了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與無產階級革命階級革命的理論。這樣，馬克思算得一個完全的知識分子。他與半知識分子有別，他參加了實際革命運動，他回到實際中去加以調查研究，概括了各種東西，這種概括的知識，就叫做理論，我們黨內需要許多同志做這樣的工作。我們黨內現在有大批同志可以從事於這樣的理論研究工作，他們大都是聰明有為的人，這些同志我們要寶貴他們，要尊重他們。但是他們的方針要對，過去的錯誤，他們不要重複。他們必須拋棄教條主義，必須不停止在現成的書本上。

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了又向客觀實際得到了證明的理論，沒有別的任何東西可以稱得起我們所講的理論。斯大林曾經講過，脫離實際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空洞的理論是沒有用的，不正確的，應該拋棄的；好談這種空洞理論的人，應該伸出一個指頭向他刮臉皮。馬列主義是從客觀實際產生出來及向客觀實際獲得了證明的最正確最科學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許多讀馬列主義的人，卻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條，這就是阻止了理論的開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另一方面，我們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如果誤用了他們的經驗，也是要用毛病的。不錯，這樣

的人經驗很多，這是很可貴的。但是，就以經驗為滿足，那也很危險。他們須知自己的知識是偏於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識與普遍的知識；就是說，缺乏理論，他們的知識也是比較的不完全。而要把革命辦好，沒有比較完全的知識是不行的。

這樣看來，有兩種不完全的知識：一種是現成書本上的知識，那怕是馬列主義，也可以使它變成空洞的東西。一種是偏於感性與局部的知識，沒有發展成為理性的與普遍的東西，這兩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結合，才會產生好的比較完全的東西。

但是，我們工農幹部要學理論，必須首先學文化，沒有文化，馬列主義理論就學不進去。學好了文化，隨時都可學習馬列主義。我幼年沒有進過什麼馬列主義的學校，學的是「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一套，（笑聲）我識字便是從這裏學來的。譬如「學習」兩個字，就都有了，我可以再用這兩個字來學習馬列主義。何況現在不學孔夫子，學的是新鮮的國文史地與自然常識，這些文化課學好了，到處有用。我黨中央現在強調工農幹部學習文化，因為學了文化以後，政治，軍事，經濟那一部門都可學。否則工農幹部雖有豐富經驗，卻沒有上升到理論的可能。

由此看來，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必須使上述兩種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發展，必須使兩種人互相結合。有書本知識的人向實際方面發展，然後才可以不停止在書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學習，要認真讀書，然後才可以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

合性，上升到理論，然後才可以不把局部經驗認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以不犯經驗主義的錯誤。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兩者都是主觀主義，是從不同的兩極發生的東西。

所以我們黨內的主觀主義有兩種：一種是教條主義，一種經驗主義。他們都只看到片面，沒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這種片面性的缺點，並而力求改進，那就容易走上錯誤的道路。

但是這兩種主觀主義，現在在我們黨內主要的還是教條主義最為危險。因為教條主義容易裝出馬恩列斯的面孔，嚇唬工農幹部，把土包子俘虜過來，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農幹部都不易識破他們的面孔。也可以嚇唬天真瀟灑的青年人，把他們充當俘虜。我們如果把教條主義克服了，就可以使有書本知識的幹部，願意和有經驗的幹部相結合，願意從實際事物的研究，可以產生許多理論與實際結合的良好工作者，可以產生許多真正的理論家。我們如果把教條主義克服了，就可以使有經驗的同志得到良好的先生，使有經驗的同志上升到理論，而避免經驗主義的錯誤。

除了「理論家」與「知識分子」兩個糊塗觀念而外，還有天天念的一句「理論與實際聯繫」，在許多同志中間，也是一個糊塗觀念。他們天天講「聯繫」實際上卻是講「隔離」，因為他們並不去聯繫。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是怎樣互相聯繫呢？拿一句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的要對準靶。馬列主義對中國革命的關係，就是箭與靶的關係。

係。有些同志卻在那裏「無的放矢」亂放一通，這樣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壞。有些同志則僅僅把箭拿在手裏，搓來搓去，連聲讚曰：「好箭好箭」，卻老是不願意放出去，這樣的人就是古董鑑賞家，幾乎和革命不發生關係。馬列主義的箭必須用了去射中國革命之的。否則，我們爲什麼要去學馬列主義呢？是不是因爲我們吃了小米不得消化，因此要念消食經呢？（笑聲）我們黨校確定要學馬列主義是爲了什麼呢？這個問題不講明白，我們黨的理論水平永遠不會提高，中國革命也永遠不會勝利。

我們的同志必須明白，我們學馬列主義不是爲了好看，也不是因爲它有什麼神祕，好像道士們到茅山，學了法就可降妖捉怪一般，它也沒有什麼好看，也沒有什麼神祕，它只是很有用。直到現在，似乎還有不少的人，把馬列主義看作現成的靈丹聖藥，只要得了它，就可毫不費氣力的包醫百病。這是一種幼稚的愚昧，我們對這些人還應該作啓蒙運動。那些將馬列主義當宗教教條看待的人，就是這種蒙昧無知的人。對於這種人，應該老實的對他說：你的教條沒有什麼用處，說句不客氣的話，實在比屎還沒有用，我們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條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麼用處呢？（笑聲）同志們，你們會知道，我這樣說的目的，就是故意挖苦那些把馬列主義看成教條的人，使他們大吃一驚，甦醒過來，好拿正確的態度對待馬列主義。馬恩列斯曾經反覆的講，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這些人偏偏忘記這句最

重要的話。中國共產黨人只有在他們拿了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應該用於中國，從中國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創造出理論來，才叫做理論與實際相聯系，如果只是口頭上講聯系，那末，講一百年也是無益的。我們反對主觀的片面的看問題，必須攻破教條主義的主觀性與片面性。

摘錄自「整頓學風黨風文風」

知識青年的自我改造

作爲一個知識青年的我們，除了應該發揮我們的特長和優點以外，還應該以負責的嚴正態度來正視我們的短處和弱點，勇敢地以實踐的精神去進行自我改造。

其所以要進行自我改造：一方面是我們知識青年，由於長期的和直接的勞動生產脫節，而舊的社會制度又把我們和勞動人民之間隔離開來，因而事實上是存在着一些短處和弱點；一方面更因爲我們知識青年在中國人民解放鬥爭中，以及在民主建設事業中，擔負着極其重大的責任，需要我們更堅實更有作爲。至於自我改造對於我們知識青年的個人，那還祇是把它作爲人民解放鬥爭和民主建設事業的一部份來看，才也自然有其極重大的意義。

究竟我們知識青年存在着那些短處和缺點呢？具體到每個個人來講，那是各不相同的，一般說來，主要的有以下幾點：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和勞動羣衆的關係問題——正因爲我們知識青年享有知識，可是就今天來講，我們知識青年這種知識的來源，往往主要不是從與自然鬥爭及與社會鬥爭的親身體驗中得來，而主要是從書本上得來的理論知識；往往主要不是從親身參加羣衆活動中得來，

而是個人的鑽研；因而，在我們的思想對於知識的來源就產生一種錯誤的認識，以為知識是祇有從書本中憑個人的鑽研才可獲得的，不了解實際上一切知識都是勞動羣衆在勞動活動中的成果，沒有廣大的勞動羣衆，沒有羣衆的勞動活動，任何知識都不會存在，而書本上的知識：如果不與廣大勞動羣衆的實際鬥爭相結合，就必然會變成腐朽無用的東西。

由於我們對於知識來源的認識上的錯誤，這就會產生了：無視勞動羣衆的力量，輕視勞動羣衆；即令我們在主觀願望上是想爲羣衆服務，而在實際行動上卻表現爲不懂得把自己擺在勞動羣衆當中，作爲勞動羣衆之一員，依靠勞動羣衆自己的力量去爲羣衆服務；把「爲羣衆服務」理解成自己是站在羣衆之外，以英雄豪傑的姿態去爲羣衆服務的，正因爲如此，所以我們不能真正體會羣衆的心情，不能深刻表現羣衆的意旨，不能不斷接受羣衆的教育，自然也就易於在羣衆的鬥爭活動中，產生錯誤。

其次，就是我們知識青年往往會陷於一種主觀的幻想，不切合實際。——這種從主觀願望出發的根源是什麼呢？其實也是從前面所說的那個原因所派生出來的東西，因爲知識的發展，本來是人類在勞動活動中先吸收到一些表面現象成爲感性的知識，然後積累了很多這樣的感性知識，逐漸綜合提高，找出它的規律性，才算爲理性知識的，而我們知識青年卻往往是倒過來一開頭就接受這種理性知識，因而對於具體事物實際的發展過程，卻缺乏體驗，缺乏了解；同樣，

正由於我們對於具體事物的實際發展過程缺乏深刻的體驗和了解，因而我們就往往易於誇大主觀的力量，而無視事物客觀的實際條件。

由於我們知識青年，往往長期的脫離了羣衆的實際鬥爭，沒有親身體會事物是怎樣在發生困難與克服困難這種矛盾鬥爭中發展起來的，由於我們易於誇大主觀的力量，所以，我們就每每對於具體的事物缺乏實際的了解。主觀的活動一經離開了實際條件，便會想入非非，而我們知識的來源，既然避開了羣衆勞動的這種知識淵泉，於是，我們主觀活動的範圍，也就愈過愈狹小，終於走到牛角尖裏而不能自拔。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不能正確的認識事物，不能確當的反映事物，分析事物，不能跟上事物的發展，也不能預見並推動事物的前進。超現實的估計事物，超條件的處理問題，錯誤自然會發生。

其次，就是我們知識青年往往易於偏重紙上談兵，口頭講理，而害怕或忽視實踐的行動——這個原因也是由於不實際，缺乏羣衆的鬥爭鍛鍊來的，更因為紙上談兵，口頭講理，究竟是比較容易的，實踐的行動卻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它需要很大的毅力與頑強不屈的鬥爭精神，紙上談兵，口頭講理，往往還不足以表現我們思想的真實，筆下口頭儘管寫得或說得怎樣好聽，真正思想上的醜惡，還可掩蓋於一時，而實際的行動卻無情地把我們思想上一切真正的美與醜都給暴露出來。

可是，一切事物不是光紙上談兵，口頭講理，就可以真正向前發展起來的，必須有實踐的行動才可以真正運動起來，我們青年朋友們天天想進步，寫進步文章，說進步話，難道就能算是進步了嗎？自然不能，必須在實踐的行動中真正進步起來，才能算是「進步」也才會進步。

我想，這一點我雖然說得還很抽象，但我以為是應該特別強調的，從我親身的體會中，從關東青年（雖然我對於關東青年並不太了解）的當前情況來講，提倡立即投身於實踐的行動，反對「秀才造反式的坐而論道」，無論對於我們知識青年的自我改造，對於人民解放鬥爭和民主建設事業，都更具有現實的意義，更應該特別重視。

我這裏所說的，是泛指連我在內一般知識青年所共同的幾個基本的主要毛病，其他的毛病，往往也是從這幾個基本毛病產生的，倘使具體到我們知識青年的每個個人，則又各有程度上不同的主要毛病，這就需要各個人自己去檢查。而且，我這裏所說的還是指我們願意進步要求進步的進步青年而言，至於那些極少數甘心以爬在地上吮舐剝削階級殘羹剩飯為榮的所謂「知識青年」，他們的毛病，就不止於這些了。

克服這些毛病，不是不可能的，其主要的藥方，乃是在於勇敢地以實踐的行動去參加勞動羣衆在各方面的鬥爭，和他們在一起，領受他們的教訓和鍛鍊，正視血淋淋的現實，大膽的改造自己。

從「五四」起，我們偉大中國的知識青年，在自我改造上，盡了很大的力量，也有了很大的成就，我們中國的青年運動，在整個中國人民解放鬥爭和民主建設事業中（特別是從抗日戰爭到自衛戰爭，從解放區到反動派統治區的青年鬥爭）其所以能够起着極其重大的作用，是與我們知識青年的自我改造的成就，有着密切關聯。亦正由於有這一點，所以我們中國青年才能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稱讚，才能成爲全世界最優秀青年的一部份，我們中國青年的自信心與自尊心是從這裏來的！

是時候了！中國在大翻身，地球在大翻身，我們如果還吝惜自己身上的污垢，時代的車輪卻不會吝惜拋棄黏在它身上的灰塵！

——「青年修養漫談」

知識分子今天的任務

吳 晗：

知識份子不是一個階級，而是一個階層。因為第一沒有共同的經濟基礎，利害不一致。第二知識份子的社會身份是不固定的，可上可下的，是可變的，因之有幫兇幫閑，爬在桌子底下等啃骨頭的知識份子，也有堅苦卓絕，為人民服務的知識份子，有搖身一變為買辦部長之流的知識份子，也有為民前鋒以先覺覺後覺，喚醒民衆的知識份子。

今天的知識份子和過去的士大夫不同，首先士大夫是封建官僚社會的產物，而知識份子則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產物。其次，士大夫是一個階級，儘管有派系閥閱鄉里之爭，並不一致，但是，在對上幫兇幫閑，對下剝削鎮壓，腦上慮下這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第三則大夫「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主子只有一個，除此之外別無出路。而知識份子則「有奶便是娘」，就「食人之祿忠人之事」這一點而論，道地是士大夫的真種。最近居然有人贊成扶日，同意司徒的聲明，有人認為今天的局面是「差強人意」，便是這類知識份子的最好典型。

今天知識份子的知識是商品化了的，進學校，留洋，都是投資，獲得知識以後，作為商品而取得職業和社會地位。換言之，知識份子的社會地位是以投資的多少來決定的，最上層的是留洋

的博士碩士之類，次之是大學中學小學畢業。鍍金鑲銀是一般知識份子夢寐以求的終南捷徑，這正是半殖民地社會的特徵。

另一方面，所謂半封建社會的產物，是指原來士大夫的劣根性，如對人民的無限度剝削，自私自利，自尊自大，不合作，慣於妥協，遇事不肯負責任，推托、敷衍、虛偽、欺騙、口是心非，以至掛羊頭，賣狗肉，諛上驕下這一套，全繼承了下來。結果是成爲民族罪人。

當然，也還有光明的一面，從社會變革中覺醒的知識份子，肯接受新思想，對現局有正確理解，能够揚棄上面所指那一套劣根性，勤於學習，能用腦子，也能動手。中國未來的前途，就寄托在這一羣人身上。同時，我們要瞭解，知識份子成爲一個階層，知識爲少數人所享有，這是現在社會的污點。我相信，在未來的日子裏，獲得知識是義務而不是權利的時候，人人都是知識份子，這個階層也就沒有了。

今天知識份子的任務，就在於摧毀這個階層，洗掉這個污點，建立以獲得知識爲義務的新社會。

要做到這點，必需改造自己，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爲人民服務。

嚴景耀：

現社會許多知識份子，還是有意無意地存着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他們大多是專爲自己的利益打算，不顧大衆福利的。這是舊社會傳下來的遺毒。在民主社會中，這種遺

毒是要不得的。許多人以為中國不能民主化，主要的原因是人民教育程度不够。但是我們看知識份子自己，是否能實行民主呢？越是大學教授，好像越不能實行民主。他們雖然具備着一套一套的民主理論，可是專為學生預備的，自己是想不到實行的。最好的知識份子，大多潔身自好，以為大家像他能各自努力，社會就可進步。這種人不管本行以外的事，因此也不顧問政治，至多打聽打聽消息而已。記得有一次和一位醫生談話，我說在自私自利的社會中，醫生是無法實行為人民服務的志願的，他說「你的話我很同情，希望你們把政治搞好，然後我們可以安居樂業，也可為社會服務了。」我說政治民主化是要大家努力的，他就乾脆地說「這和我的職業無關，不是我的事情。」而許多大學教授和自由職業者也是如此看法。其實這種知識份子，處在目前日益崩潰的社會中，除了同歸於盡以外，是沒有出路的。還有不少知識份子，表面上是道貌岸然的，講到批評現社會也是頭頭是道的。但暗中往往做着幫閒的勾當，希望一旦能飛黃騰達，鑽到士大夫的圈子裏，去享受他的富貴榮華。這種人只要自己有利可圖，就會踏着別人的頭爬上去的。所有的貪官污吏與賣國漢奸，那一個不是知識份子變出來的？

要消滅這個自私自利的缺點，只有參加組織，團結起來，使個人與團體打成一片。只有在集體生活與工作過程中，才能把個人的利益與團體的利益，變成一致，才能放大眼界，漸漸洗刷掉個人主義的遺毒。

團結以後的知識份子，是能發揮力量的。我們看各種團體中的知識份子，都在發生他們的作用。他們在反動團體中，做着害國害民的罪惡，但是在進步的團體中，他們就起着進步的作用。要知識份子消滅個人主義，發揮進步的集體力量，只有首先把進步的知識份子團結起來，一面吸引中間的搖擺份子，一面打擊反動的幫閒份子。同時，知識份子只有和人民大眾共同一起生活着，或深切地感受着人民生活的脈搏，才是人民大眾的知識份子，才能為人民大眾謀福利，也才能為自己謀出路。所以知識份子今日的任務，首先是自己組織起來，與人民共同奮鬥。不然，促進大時代發展的任務，不會落在個別知識份子肩上的。

樊弘：我覺着知識份子今日的時代任務，拿中庸上的一句話來說，就是「裁者培之，傾者覆之」。

我是學經濟的，當然離不開經濟的觀點。我以為自然科學發達到今天，而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還沒有被充份發揮來改善人類的生活，這是最大的悲哀。以自然科學的發達說，我們今天應該人人有飯吃，有衣穿，有工做。但事實上卻一部份人在天堂，一部份人在地獄，這是我們知識份子所最不能忍受的。

我以為知識份子在今天應該作社會主義理論的鬥士，在一方面促成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沒落。因為封建主義是反科學的。資本主義雖然口頭上贊成科學，而現在的資本主義已經不能把自

然科學的成果充份應用出來增加生產，這從資本主義的週期的恐慌和勞動者的長年的失業可以證明。所以在消極方面知識份子應該促成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覆滅。在積極方面，應該發揚社會主義的前途，承繼並發揚光大馬克斯和列寧的遺產。在行動方面方法固然很多，但知識份子獨特的任務，乃在從理論上暴露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破壞的寄生的和腐爛的性質，和發揚社會主義的建設的生產的和向上的性質。在過去的歷史上，知識份子爲了擁護真理常常遭到無理與貪慾的迫害，歷史告訴我們，凡是擁護真理的人，必然是要到處遭遇無理和貪慾的迫害的，特別是在今天的中國。

知識份子必須反對傳統的儒家哲學，儒家哲學發達的結果，在文化上是統於一尊，在政治上是開明專制，在社會上是擁護私產和輕視勞工。其次我們要反對的是英美資本主義的文化，因爲英美資本主義的文化是建築在布爾喬亞剝削勞工的基礎上。英美資本主義文化不能在中國生根和發育就因爲中國不願意接受這種剝削的文化，而且中國根本就沒有壓倒一切的布爾喬亞階級。不幸少數的知識份子對它卻還抱着幻想。

我深深覺得我們應該了解中國的現實，但在現代的各種學說之中能够分析中國現實的，比較的還是馬克斯和列寧的學說。中國的前途，恐怕一定不出馬克斯列寧所指導的方向。知識份子應該迎接這個新的學說，這是中國的知識思想上唯一的曙光，也就是中國唯一曙光。我們接受新學

說，不是說真理完全在這種學說裏，我們一面接受，一面創造；一面認識它們，一面并要努力的超過它們。今天中國的道路已經由中國的歷史決定了：封建的道路走不通，英美資本主義的道路也走不通，既然如此，知識份子就只有一條大路，一個任務。這個任務就是努力去作一個社會主義理論的鬥士。在理論上幫助被壓迫的勞苦大眾起來，以團結的力量建立新中國，但莫要忘了我們所起的作用卻只是橋樑作用，而非攀登彼岸後的建造新中國的主力。建造新中國的主力還是中國的勞苦的大眾。如果我們不走這條路，必然碰釘子，碰了釘子，末了再回到這條路上來，不如不碰釘子，乾脆走這條路。這還有什麼可以猶豫的呢？

中國知識份子今日時代任務，拿中庸上的一句話來說，就是「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是要覆滅的，我們應該促使它的覆滅；社會主義是要起來的，我們應該發揚而光大之。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本篇節錄在平舉行的「知識份子問題座談」記錄，原載「中建」北平版第一卷第二期）

爭取·團結·改造·培養知識分子

爭取、團結、改造、培養知識分子——這是全解放區目前的重要任務之一，這是打倒反動派、建立新中國的偉大事業所不可缺少的條件之一。中共中原中央局在九月二十九日爲這個問題所發佈的專門指示，值得其他解放區特別是新解放區的參考。

中原局的指示首先分析目前中原地區知識分子的狀況及其與革命的關係，它指出：在中原地區曾在大中學校畢業或肄業學生及中小學校的教職員和公務人員，數以千、萬計，他們曾經在國民黨極端反動與日趨崩潰的統治下，飽嘗失業、失學、言論身體無自由，生活生命無保障的各種痛苦與摧殘，其中大多數已看清國民黨的壽命快要完結，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十分痛恨，對於日益發展的人民革命運動則寄予同情和希望，自我軍進駐中原之後，已有成千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大中學生和教師們，都相率來解放區就學，執教或從事其他革命工作。並有不少的知識青年是從蔣佔城市、甚至不遠千里、衝破重重封鎖、冒着生命危險投奔解放區者。這些事實，充分表現了他們對於中國共產黨與人民解放軍的熱愛。知識分子是我們在中原解放區培養各項建設人才的一個主要來源，是解決我們目前及今後在各種建設工作中幹部困難的一個重要途徑，同時也是我們

在新區建立廣泛的抗美反蔣統一戰線，穩定社會秩序，聯系當地羣衆的一個重要力量。所以，大量爭取團結知識青年，就成爲當前中原黨的重要任務之一。但是由於我們在中原地區對於主動地爭取與團結知識青年工作的忽視與某些政策上的錯誤，以及國民黨反動派欺騙宣傳的影響，他們中間還有不少人尙對我黨抱着懷疑觀望態度。又因爲他們多半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家庭出身，長期地受資產階級教育的薰染，他們的大多數雖然傾向革命或有傾向革命的可能，但一般都存在輕視工農，脫離羣衆的觀點。因此，要使他們能够「爲人民服務」，「與工農結合」，從事各種艱鉅的建設工作，就非進行必要的宣傳解釋工作與思想改造工作不可。這就是說，要使他們在政治上認識中國革命的形勢、前途和中國共產黨的主張，確定爲人民服務的革命立場，在思想上拋去自高自大，自以爲是的惡習，養成實事求是、虛心學習的作風。要做到這一點，最主要的當然是依靠他們在實際鬥爭中去經受長期的鍛鍊，但事先加以必要的訓練教育，使他們在思想上獲得初步的啓發，則是進行改造的前提條件。

根據上述的分析和已有的經驗，中原局在指示中對於爭取、團結、改造和培養知識分子，規定了如下的步驟：

首先，在我們的各級領導機關，應從政治上去認識這一工作的重要性，應利用各種機會（如各種會議上的講話、報告、文娛活動等）通過各種方式（如報紙、佈告、標語、傳單、漫畫等進

行口頭的或文字的宣傳。)說明我黨對於知識分子的政策方針，指示中國知識分子應走的道路，消除他們對我們的顧慮，使其逐漸地了解我們，靠近我們。

其次，就是開辦各種較短期的學校或訓練班，號召與動員他們來學習受訓。並酌量吸收當地知識分子中有地位有威信的教員學生參加學校與訓練班的工作。在這些學校與訓練班內，一般地當先學習政治，後學習業務。時間一般至少需三個月至四個月。政治學習以時事問題，中國革命基本問題及我黨基本政策為主。

第三，由各級民主政府召開各種各樣的知識分子座談會，向他們報告解釋並發動他們討論時事與政策，使他們了解國民黨必敗，共產黨必勝，選定他們所應該走的道路。

第四，維持、恢復或創設新的正規學校(這在新解放的城市中特別重要)，以便較長期地培養大量新的知識分子，並使原有大中學校的教員教授，得以繼續從事教育事業。但目前這一工作的重點，應放在爭取團結與改造現有的知識分子身上。

指示者重指出在實施爭取與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時，應注意下列具體問題的正確處理：

(一)各地在舉辦各種訓練班與幹部學校時，要防止產生無政府無組織狀態，要反對自由主義與本位主義，避免彼此爭奪的不良現象。要按照黨的正確政策與統一行動具體進行爭取改造工作。

(二)對於新來的知識分子，生活上（伙食、衣服、學員學習用品等）不妨放寬一點，但思想上則應該提倡「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的艱苦作風。特別是參加訓練工作的幹部，必須以身作則，去影響他們。

(三)在學習中，要提倡民主自由的作風，使學生毫無顧慮地說出他們自己心中要說的話。這是爭取團結與改造他們的一個重要條件。這種思想上的民主與自由，是為着便於青年經過充分的自覺，從爭論和研討中認識真理，而不是對於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採取自流和放任態度。

(四)在這種非黨的學校與訓練班中，必須禁止採取三查、整風、審幹等辦法；而應採用座談會、討論會、辯論會、壁報等羣衆活動的方式，展開思想爭論，解決思想問題，學生和公教人員經過蔣介石多年的特務統治，不免混有少數堅決反革命分子和特務分子，應當由政府予以查究。但是對於普通的國民黨員三青團員，因他們多半是爲了求得學習或職業而被迫加入，其餘的也不是堅決反革命分子，故應分別對待。應當讓他們經過一定時期的學習，對我們的政策有了初步認識，願意已經消除或減少之後，再動員他們登記或將實情報告一定的組織。這樣既可以使這些雖然曾經加入過國民黨的組織，但思想上與國民黨絕少聯繫的人敢於說出自己真實的歷史，又可以使少數真正暗藏的特務分子孤立與暴露出來。

改造我們的學習

這是一九四一年五月我在延安幹部會上的一个演講，現按當時演講提綱整理發表，以供同志們討論。我主張將我們全黨的學習方法與學習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一

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就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互相結合的二十年。如果我們回想一下，我黨在幼年時期，我們對於馬列主義的認識與對於中國革命的認識是何等膚淺，何等貧乏，則現在我們是深刻得多、豐富得多了。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一百年來，其優秀人物奮鬥犧牲，前仆後繼，摸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找到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作為解放我們民族最好的武器，而中國共產黨則是拿起這個武器的倡導者，宣傳者與組織者。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抗戰以來，我黨根據馬、恩、列、斯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戰的具體實踐，研究今天的中國與世界，是進一步了，研究昨天的與前天的

中國也有某些開始。所有這些，都是很好的現象。

二

但是我們還是有缺點的，而且還有很大的缺點。在我看來，如果不糾正這類缺點，就無法使我們的工作更進一步，就無法使我們在將馬、恩、列、斯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的偉大事業中更進一步。

首先來說研究現狀。像我黨這樣一個大政黨，雖則對於國內國際現狀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績，但對於國內國際的各方面，對於國內國際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們所收集的材料還是零碎的，我們的研究工作還是沒有系統的。二十年來，一般地說，我們並沒有對於上述各方面作過收集材料與着重研究的系統的周密的工作，缺乏調查研究客觀實際狀況的濃厚空氣。「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粗枝大葉，誇誇其談，滿足於一知半解，這種極壞的作風，這種完全違反馬列主義基本精神的作風，還在我黨許多同志中繼續存在着。馬、恩、列、斯教導我們認真的研究情況，從客觀的真實的情況出發，而不是從主觀願望出發，我們的許多同志卻直接違反這一真理。

其次來說研究歷史。雖則有少數黨員與少數同情者曾經進行了這一工作，但一般是不會有組

織地進行過。不論是近百年的（昨天的）與古代的（前天的）中國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許多馬列主義的學者也是言必稱希臘，只會記誦馬、恩、列、斯的成語，對於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認真研究現狀的空氣是不濃厚的，認真研究歷史的空氣也是不濃厚的。

其次說到學習國際革命經驗，說到學習馬、恩、列、斯的普遍真理。許多同志似乎是爲了馬、恩、列、斯而去學馬、恩、列、斯，並不是爲了中國革命的實踐。所以學的雖多，消化不了；引證馬、恩、列、斯的成語是很會的，運用馬、恩、列、斯的立場與方法，具體地研究中國現狀與中國歷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與解決中國革命問題則是不會的。這種對待馬列主義的態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別是對於中級以上幹部及青年學生，害處很大。

上面我說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研究歷史，不注重馬列主義的應用，這些都是極壞的作風。這種作風傳播出去，害了我們許多的同志。

確實的，現在我們隊伍中確有許多同志被這種作風帶壞了，他們對於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具體情況，不願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僅僅根據一知半解，根據「想當然」，就在那裏發號施令，這種主觀主義的作風，不是還在許多同志中間存在着嗎？

對於自己的歷史一點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爲恥，反以爲榮。特別重要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與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經濟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

年的軍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簡直還沒有人認真動手去研究。有些人對於自己的東西既無知識，於是剩下了希臘及外國的故事（限於故事）；也是可憐得很，從外國故紙堆中抽象地搬來的。幾十年來，很多留學生都犯過這些毛病，他們從歐美日本回來，只知生吞活剝地搬外國，他們起了留聲機作用，忘記了自己創造新鮮事物的責任，這種毛病也傳染了共產黨。

我們學的是馬、恩、列、斯，但是我們中的許多人，他們學馬、恩、列、斯的方法是直接違反馬、恩、列、斯的。這就是說，他們違背了馬、恩、列、斯所諄諄告誡人們的一條基本原則：理論與實際統一。他們既然違背了馬、恩、列、斯的這條原則，於是他們自己就造出了一條相反的原則：理論與實際分離。在學校教育中，在在職幹部教育中，教哲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原則，教經濟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經濟的特點，教政治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策略，教軍事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軍事特點，諸如此類，其結果，謬種流傳，誤人子弟。在延安學了，到郵縣就不能應用。經濟學教授不能解釋邊幣法幣，當然學生也不能解釋。十七八歲的娃娃，教他們唱「資本論」，唱「反杜林論」。這樣一來，就在許多學生中造成了一種反常心理，對中國問題反而無興趣，對黨的指示反而不重視，他們一心嚮往的，就是他們從先生那裏學來的據說是萬古不變的教條。

當然，上面我所說的是極壞的典型，不是說普遍如此。但是確實存在這種典型，而且是相當

的多，害人相當大的，不可等閑視之的。

三

爲了反覆說明這個意思，我想將兩種互相對立的態度對照地講一下。

第一種：主觀主義的態度。

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對周圍環境不作系統的周密的研究，單憑主觀熱情去工作，對於中國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割斷歷史，不懂得希臘，不懂得中國，對於中國昨天昨天的面目漆黑一團。在這種態度下，就是抽象地無目的地去研究馬、恩、列、斯的理論，不問它與中國革命有什麼聯繫；不是爲着要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策略問題而到馬、恩、列、斯那裏找立場找方法，而是爲理論而理論，爲馬、列而馬、列。不是有的放矢，而是無的放矢。馬、恩、列、斯教導我們說：從客觀存在着的實際事物出發，從其中引出規律，作爲我們行動的基礎。爲此目的，就要詳細佔有材料，加以科學的分析及綜合的研究。我們許多人卻相反，不去這樣做。其中許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他們對於研究今天的中國與昨天的中國一概無興趣，只把興趣放在現成的書本上，許多人是做實際工作的，他們也不注意客觀情況的研究，往往單憑熱情，把感想當政策。這兩種人都憑主觀，忽視客觀。或作講演，則甲乙丙乙，一二三四的一大

申。或作文章，則誇誇其談的一大篇。無實事求是之意，有譁衆取寵之心。華而不實，脆而不堅，自以爲是，老子天下第一，欽差大臣滿天飛。這就是我們隊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風。這種作風，拿了律己，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則害了革命。總之，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論，是共產黨的大敵，是無產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表現。大敵當前，我們有打倒它之必要。只有打倒主觀主義，真理才會抬頭，革命才會勝利，黨性才會鞏固。沒有科學態度或沒有完全的科學態度，即是說，沒有或不完全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統一的態度，就叫做沒有黨性，或叫做黨性不完全。

有一首對子，是替這種人畫像的。那對子說：

「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

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

對於沒有科學態度的人，對於只知背誦教條的人，對於徒有虛名並無實學的人，對於向馬列主義開玩笑的人，你們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診治自己毛病的話，我勸他把這首對子記下來，或再勇敢一點，把它貼在自己房子裏的牆壁上。馬列主義是科學，科學是老老实實的學問，任何一點跳皮都不行的，我們還是老實一點吧！

第二種：馬列主義的態度，即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態度。

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對周圍環境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不是單憑熱情去工作，而是把革命熱情與實際精神結合起來。在這種態度下，就是不要割斷歷史，不單要懂得希臘，而且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今天，還要懂得昨天與前天。在這種態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列主義，要使它與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是爲着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與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方法的。這種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列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找這根「矢」，不是爲了別的，是專門爲了要射中國革命與東方革命這個「的」的，否則這「矢」就不過是一個徒供玩好的古董，一點甚麼用處也沒有。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着的一種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週圍事變的內部聯繫，作爲我們行動的嚮導。而要這樣，就須不憑主觀想像，不憑熱情，不憑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佔有材料」，從這些事實中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這種結論，不是甲乙丙丁的現象排列，也不是誇誇其談的濫調文章，而是科學的結論。這種態度，有實事求是之意，無譁衆取寵之心。這種態度，就是黨性，就是理論與實踐統一的馬列主義的作風，就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應該具備的態度。如果有了這種態度，那就既不是「頭重腳輕根底淺」，

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四

依據上述意見，我有下列提議：

(一) 向全黨提出系統地周密地研究周圍環境的任務。依據歷史唯物論的方法，對敵友我三方的經濟、財政、軍事、文化、黨務各方面的動態進行詳細的調查研究工作，然後引出應有的與必要的結論。爲此目的，就要引導同志們的眼光向着這種實際事物的調查研究上去，就要使同志們懂得，共產黨員及其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於了解情況與掌握政策兩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謂認識世界，後一件事就是所謂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們懂得，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誇誇其談的亂說一頓與一二三四的現象羅列，都是無用的。例如關於宣傳工作，如果不了解敵友我三方的宣傳狀況，我們就無法正確地決定我們的宣傳政策。任何一個部門的工作，都必須先有情況了解，然後才有好的處理。在全黨推行調查研究的政策，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

(二) 對於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做去，廢除無組織狀態。應先作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研究，然後才有可能作綜合研究。

(三) 對於在職幹部教育與學校幹部教育，應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爲中心，由此出發去

研究馬列主義，廢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列主義的方法。研究馬列主義，又應以聯共黨史為中心材料，其他一切為補助材料。聯共黨史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綜合與總結，是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上還只有這個完全的典型。我們看到列寧史大林他們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蘇聯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又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就可知道我們在中國是應該如何工作的了。

我們走過許多錯路，但錯誤常常是正確的先導。在如此生動豐富的中國革命環境與世界革命環境中，我們這一學習問題上的改造，相信一定會有好結果的。

論集體學習

一切以自學為主

向羣衆學習，到羣衆當中去尋找知識，這是我們「學習」和「尋找知識」的基本觀點或基本態度和基本立場。而在我們「尋找知識」的步驟上，或者說「學習」和「尋找知識」的範圍，則包括文化的知識，業務知識，政治知識和理論知識等項。其目的所在，應該是如毛先生所說，要「使我們成爲一個有完全知識的人，成爲一個完全的知識分子，即『可使半知識分子，變爲名符其實的知識分子。』」

這種「完全的知識」和「完全的知識分子」的造就，決不能單純由所謂學校教育來完成，更不可能靠像蔣管區那樣的各級學校來完成。毛先生在前面說過：「我們現在看看一些學生，看那些從社會實際活動完全脫離關係的學校裏而出身的學生，他們的狀況是怎樣呢？一個人從小學一直讀到大學畢業了，算有知識了，但是他們一不會耕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打仗，四不會辦事，這些都沒有幹過，這些實踐的知識一點也沒有，他們有的只是書本知識，這樣的人是否可以

算得一個完全的知識分子呢？我以為很難，至多算得一個半知識分子，因為他們的知識還不全。」可見學校教育是不能造就一個完全的知識份子的。但毛先生這裏所說的學校——「那些從社會實際活動完全脫離關係的學校」，好像還不是指的一般很壞的學校，就是說還不是指的蔣管區裏的那些黨棍黨狗辦的學校。如果是那些黨棍黨狗辦的學校，那就連半知識分子也造就不出來，因為那些黨棍黨狗，他們所需要的根本不是知識分子，而是奴才、狗腿子、特務、法西斯棍。所以他們不許有一個半個好的教授——有學問道德的教授，進步的教授，留在學校裏，也不許學生親近好教授，不許學生讀好一點的進步一點的書，馬列主義的書，如果被他們發見了，就是犯罪的罪證，更不許學生干預外事，過問政治，且不許學生處理學生自己的事，有自己的組織，例如學生自治會，讀書會，座談會等。今年一月二十九日 上海同濟大學的學生就是爲了學生自治會組織的獨立性，自主性，而被蔣政府命令軍警，大肆捕殺。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所以這樣的學校已不是學校，而是學生的「煉獄」了。

這樣的壞學校，固然不能造就任何知識分子，毛先生說的那些一般不很壞的學校，也只能造半知識分子，就是現在人民解放區，即在新民主主義的民主政權之下所辦的各種學校，也不能把社會實踐的知識，生產鬥爭，階級鬥爭，民族鬥爭的實際行動知識，在學校教育的書本上，課程上交給每一個人。所以毛先生說：「有什麼辦法使半知識分子，變爲名符其實的知識分子呢？惟

一的辦法，就是使一切僅有書本知識的人，回到實際工作去，變為實際工作者，而對於從事理論工作的人，則回到實際研究中去，這樣就可以達到目的。」一個實際工作者，是不能以學校為其工作場所的，他必需要以社會為其工作場所，以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種機關為其工作場所。這裏就不能從書本上尋找知識，而要從工作崗位上尋找知識，這裏就不能從先生口中尋找知識，而要從自己在工作的體驗中尋找知識。這就是說要靠自己學習，不僅是在實際工作中尋找社會實踐，社會鬥爭的知識，要靠自己的體驗，自己的學習，就是書本上，課程上的知識，也要靠自己已有步驟有計劃的學習。一個先生決不能把一本書一門課的知識往你肚子裏倒，而且除了一本一門課以外，要讀的書真是太多了，你不自己讀，有步驟有計劃的讀，就連書本子上的知識，都將得不到。

所以我主張除了文化知識，開始非有一個時期需要被動的從學校從先生那裏學習不可，此外業務知識，政治知識，理論知識，都可以自學，都要以自學為主。除了生產鬥爭的知識，亦即自然科學的知識，如算學、理化、三角、幾何等課程非有先生口授講解不可，此外階級鬥爭，民族鬥爭的知識，亦即社會科學的知識，如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思想等課程，都是可以自學的，並且都要以自學為主。何況蔣政府的統治，還沒有結束、在賣國、內戰、獨裁的統治下，不管農村城市的人民大眾，都已陷於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境地，誰也進不起學校，即進得起學

校，那種學校已無書可讀，無知識可尋找，所以在蔣管區的人們，必需要建立一種有學校可以學習無學校也可以學習，有先生可以學習無先生也可以學習的自學制度與自學精神。即解放區的人們，除了必需從學校與先生那裏才能得到知識外，仍然要建立一種以自學爲主的自學制度與自學精神。

這種自學制度，也可以說是自學紀律。這種紀律不僅在結束學校生活以後要建立，即正在過學校生活的時候，也要建立。我記得我小的時候，亦即正在住學校的時候，我是除了學校的課程表外，還有我自定的課程表的。這就是我們的自學制度，自學紀律。這種自學精神，也可以說是一種隨時隨地隨事都學習的精神。如果我們隨時隨地隨事都留心學習，則在青年時代，固然是學習的時代；即在壯年老年時代，也是學習的時代。俗話說：『做到老學不了』。陶行知先生說：『出世便是破蒙，進棺材才算畢業。』其次上課堂聽講，進自習室自習，固然是學習，即在出了課堂自習室以外的任何地方，任何場所，也都可以學習。俗話：『宇宙就是一本大書』。陶行知先生說：『爲老百姓服務，不靠高調唱得響。農場、工場、會場、商場、廣場、戰場、娛樂場，都是我們數不盡的課堂。』復次，如果我們遇事不留心，則一切事，甚至與我們性命相關，血肉相連的事，一溜煙就都滑過去了。從任何國內外事變中，都得不到知識，學不到東西。如果留心，則水壩的蓋子被沸水衝動，有人由此發明了蒸汽機，一枚蘋果落地，有人由此發明了地心引

力。這都是自學的模範，這都是自學成功的實例。這些都證明自學是很重要的，一切都應以自學為主。

集體學習

此外當然還要注意集體學習，集體討論，建立許多學習小組，學習單位。在學習開始的時候，盡量想出許多方法，展開學習，指導學習；在學習結束的時候，檢查學習，總結學習。而且還要把工作與學習聯繫起來，在總結學習的時候，也檢查工作。這裏我把方敏先生「總結學習，檢查工作」一文，全部照抄如下：

「暑假已經過去，我們的暑期學習也告完結了。在學習開始的時候，我們會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經過這一次比較有計劃的學習，把我們的理論水準提高，把獨立工作的能力加強。現在學習結束，我們大家都來檢查一下，看看到底預期的目的，達到了沒有？達到了多少？

這裏介紹一個學習單位總結暑期學習的例子，給大家作為參考。

參加那個學習單位的朋友，他們每人都負有一分實際工作的。他們時刻警惕着：不要把學習變成只接受空洞的書本知識，而要做到真正領會所學幾個科目的精神實質，把它變成自己的思想武器，要使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去，作為行動的指南，以達到改進工

作推動工作的目的。他們既確立這樣的目的，總結學習時就有了標準。所以他們進行學習總結的時候，也檢查了工作，進行工作的總結。

他們的方法和步驟是這樣的。

第一步，他們請人來講清楚把「理論聯繫實際」的一般方法，獲得了基本觀念之後，於是開始把暑期學習的幾個科目重新進行複習，閱讀聽講筆記，翻指定的參考書籍，各人先把每個科目所包括的內容，大致弄個清楚，這亦即普通所稱的略讀的過程；進一步，研究在那個科目裏，人家是怎樣提出問題，怎樣分析問題，這樣解決問題；又研究其中心問題與整個精神是什麼（如當前時局的幾個文件，主要的精神是說明現在我們「正處於新的全國性的革命高潮的前夜」，中國事變的發展，比人們的意料要快些」，而「爲了實現一個和平的民主的獨立的中國，中國人民應當準備一切必要的條件」。）中心問題與其他問題之間的邏輯關係如何？（如研究中國革命問題，能正確把握了中國社會的性質，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任務、動力、和前途等就都有了根據，並由此產生的革命的長期性，革命鬥爭的複雜性，武裝鬥爭在極長時間內，成爲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革命在主要城市勝利以前，堅固的農村革命根據地之重要性，以及在人民羣衆中進行長期忍耐工作的必要性等，亦將隨而明瞭等等。）這亦即普通所稱的精讀的過程。

各人做了一番咀嚼工夫之後，第二步，展開組內的討論。因為在個別複習中，各人的領略不同，着重點不同（也許你對中國社會性質特別研究得深入，而他對於中國革命的特點，則理解得更周詳）所見所得不同，認識的深淺及正確程度也不同（譬如你只抽象地知道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以及由此而來的革命鬥爭的複雜性，但他則由認識到這一點，進而懂得在工作中避免過分的集中與不適當的正規化，以及工作中的簡單化，一般化和缺乏靈活性），只有展開熱烈的討論，才能切磋琢磨，取長補短，互相補充，獲得比較全面的正確的理解。

以上兩個步驟進行過了，領導學習的，隨即舉行測驗檢查，倘若檢查的結果，認為大家對於問題的精神實質把握住了，「懂得問題」已經做到，所看的，所聽的，都已融會消化吸收到自己的腦袋裏面，整個過程的前半段——總結學習，宣告完成。但能不能停止於此呢？還不能，理論還沒有和實際結合；要他的結合，得再作一番努力。這裏有一個關鍵，就是要由「懂得問題」跨前一步進入到去「想問題」。

怎樣想法？

第三步，把學習時衆多問題中，特別刺中了自己（搔着癢處）或自己有特殊感受（心領神會意有所得）的問題（如說到工作上的官僚主義路線，陳伯達指出：「特長就是命令主義，只是向羣衆強迫，只是簡單地向羣衆要東西，只是閉門造『計劃』造『公報』，千篇一律，硬套

在羣衆上面」。如果自己身上有屎，讀了一定覺得面紅耳赤，抓緊最主要的一個（刺得最痛或感受特深的，一個一個來，不要花多眼亂），以自己作爲中心（先掃門前雪），認真地想一想，這個時候，學習時所獲得理解的，好像一面鏡，要用來和自己對照一番（照照你有沒有「只是向羣衆強迫」，「只簡單地向羣衆要東西」……這時候，學有所獲得理解的，好像一把鑽，要用來尋根究底地鑽通自己的思想。「懂得問題」，似乎所學的東西，已爲己有，其實不做「照」和「鑽」的工夫，還是「身外之物，不是真懂。只有經過「照」和「鑽」，把自己所做的工作，放在正確的理论之下，加以檢查，毫無保留地進行自我批評，「懂得的問題」在腦裏起化合或分解的作用，除邪扶正，克服錯誤，發揚優點，所學的東西，才與所做的有相干，才切實受用。

單單檢查自己，反省自己，還是不夠的，局部性的，因此第四步，要由近及遠，由己及人，也檢查本部門的工作，檢查這個時期此地的以至整個的運動（如五六月「按指去年的學運，——筆者、」的支援運動，我們這間學校，這個團體，做了些什麼工作？做得對不對？對的在什麼地方，不對的在什麼地方？整個運動所決定的方針和採取的策略對不對？等等。）在這步驟裏，一定要發動熱烈的討論，展開正確的互相批評，從各個具體事件，每件具體工作的分析研究當中，得出綜合的一般性的結論，作爲今後改進工作的指針。

這時前半段那一「懂得問題」的努力，將大大地幫助了我們，正確的理论引導了我們怎樣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理论和實際作了初步的結合。

至要「擴張戰果」。第五步，检查工作所發現的經驗教訓，所獲得的正確結論，不要停留於紙上的具文，而要根據目前的具體環境，具體情況，以及新的任務和方針，定出改進工作展開新工作的具體辦法，而且實踐起來，總結學習和檢查工作的全般過程，才算完滿達成。

這樣的步驟和方法，是值得作為學習聯繫理论与實際的一個試驗的。」（載正報第二年第四期，民國三十六，九，十三出版）

以上是一個學習單位總結暑期學習的例子，它不僅把集體學習的方法、步驟、敘述得那麼有條理，而且把理论与實際怎樣聯繫的方法與步驟，也有條理的明晰的具體的指出來了。我們無論是我生產鬥爭的知識，階級鬥爭，民族鬥爭的知識，都應該好好的學習它。

——「尋找知識的方法」

論學習方法

青年人要充實自己，改造自己，必須不斷的進行學習。學習的範圍是多方面的，隨時隨地都有學習的機會。青年人不但要學習知識，學習技能，而且還要在社會生活中學習，向人民大眾學習。

社會生活是最豐富，最複雜，最多樣性的，牠好像一所大學校，一本大書，牠能夠供給你活的知識學問，解決你實際生活中所發生的問題。高爾基就會把整個社會稱做是他的大學，事實上，他的許多偉大的感人的作品，就是從豐富的社會生活經驗得來的。正因為他熟悉一切人民大眾的生活，他才會寫出許多動人的作品來。所以你應該常常和工人農民兵士接近，用心了解他們的生活，應多多的參觀學校、工廠、礦山、農家、兵營、寫字間、貧民窟、妓院、監獄，探究生存在裏面的人們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感情；應常常駐足看街頭發生的衝突，耐心讀社會新聞，特寫，地方通訊等，明瞭在社會各階層的生活中，存在着那麽多的複雜豐富的變化。

除了在社會生活中學習外，還要向人民大眾學習。因為人民大眾有對自然鬥爭和對社會鬥爭的各種實際經驗，由於他們生活的無比豐富，所以他們的經驗也是無比的淵博，值得我們去體

驗，去學習的。並且和生活相適應的，還有着大衆自己的思想形式，這種形式也是非常有力的，我們自然可以從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去領受，攝取。毛澤東說：「必需明白羣衆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往往幼稚得可笑。不了解這一點，就不可能得到起碼的常識。和全黨同志們共同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願」。劉少奇說：「學習馬列主義的理論，學習歷史，學習外國人民的鬥爭經驗，可以增加我們的知識；向敵人學習，也可以增加我們的知識；而最重要的，就是向人民學習，因為羣衆的知識，羣衆的經驗，是最豐富最實際的，羣衆的創造能力是最大的」。陳伯達說：「衆人是聖人，這是民間的一句老話。大衆的智慧是無限的，只有羣衆中具有最大的創造力。只有集中大衆的智慧，是無限的，才是最大的智慧。事實上，任何困難的問題，自己在腦中想不通的東西，一和羣衆商量，便能迎刃而解，豁然貫通」。他又說：「這裏只說羣衆思想方法一個最大的特點。羣衆（是說真正的羣衆）處理問題所以容易妥當，容易公平與合理，就是很善於對各種事情不斷反覆地加以各種比較。」又說：「反覆比較揣摩的方法，便是羣衆真正的科學分析的方法。這方法的精神，需要爲我們一切工作者所學習的。這樣的分析方法，就能够避免個人的衝動與武斷，而在任何場合，都可以容易避免錯誤。」

具有這樣完備的鬥爭知識，豐富的生活經驗的人民大衆，我們應該怎樣虛心的去向他們學習，做他們的小學生呢？可是有許多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青年，不能克服自己的「優越感」，

不能克服自己的「個人英雄主義」的色彩，他們雖然也承認一切比較完備的知識必須到羣衆中間去尋找，心裏也肯定羣衆、社會、宇宙、乃至一切自然形態的東西，才是知識的唯一源泉，可是當他們真正和人民大衆接觸的時候，卻把自己看做是了不起的英雄，自逞才能，動不動以老資格自居，確信只有自己的一切才是絕對的真理，凡是和他相反的意見，總要去糾正一下。他們抹煞了真正有知識的廣大人民羣衆，拒絕了真實可靠而寶貴的真理，卻把自己在上課、聽講、讀書、研究理論這個狹隘的學習方法與範圍內得來的一知半解的知識，不切實際的東西，像半瓶醋一樣向羣衆搖，有時甚至還討厭這些粗手大脚的工農，覺得他們說話太囉嗦，太沒有條理，不知不覺的看不起他們，不把他們放在眼裏，更不用說向他們學習了。這種態度無疑地是非常錯誤的。青年人要向人民大衆學習，要在人民大衆當中尋找知識，必須首先痛改那種動不動就去糾正別人錯誤的態度；其次，要耐心謹慎的去傾聽羣衆的意見，痛改那種見了工農就怕囉嗦的不耐煩的態度。同時還要擴大自己學習的方法和範圍，從上課、聽講、讀書、研究純理論的那種狹隘的學習方法和範圍內把自己解放出來，走到人民大衆中去，走到實際工作中去，把理論和實際聯繫起來，用實際來證明理論，用理論來指導實際。

從社會生活中學習，和向人民大衆學習，都是實際工作的學習，所得到的實際知識就是經驗。經驗是很可寶貴的，但是如果就以經驗爲滿足，那也很危險，因爲這種知識是偏於感性的或

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識和普遍的知識，就是說缺乏理論的一種比較不完全的知識。要從事革命，把革命事業辦好，沒有比較完全的知識是不行的。什麼是比較完全的知識呢？就是在學習實際知識的時候同時學習書本知識，把書本知識和實際知識結合起來，應用書本知識來分析，處理解決實際問題。

知識有兩種，一種是生產鬥爭的知識，就是自然科學的知識，一種是階級鬥爭的知識（包括民族鬥爭的知識在內），就是社會科學的知識，哲學則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概括與總結。

學習生產鬥爭的知識，必須同時兼習各種生產和業務方面的技能。要學會工廠、礦山、鐵路、合作社、大企業的管理方法和生產技術；要懂得生產過程和分配過程；要懂得改良農作法，組織勞動力，提高中國農業生產的水平。

學習生產鬥爭的知識和技能，不能沒有階級鬥爭的知識做高級的理論上的領導，否則這種知識和技能固然可以服務於工農無產階級，使得人民大眾翻身，但也可以服務於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聽憑他們的剝削和榨取。

階級鬥爭知識的社會科學的最高的成就，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聯共黨史結束語」告訴我們：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理論，乃是關於社會發展的科學，關於工人運動的科學，關於

無產階級革命的科學，關於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科學。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的力量，即在於它給黨以可能在任何環境中確定方針，來了解周圍事變底內部聯繫，來預見事變底進程，來不僅知道事變在目前是如何發展？和向那裏發展？而且知道事變在將來應當如何發展和向那裏發展？」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固然是偉大的普遍真理，是階級鬥爭知識的社會科學的最高的成就，但我們學習它，如果只知道引證它的理論和成語，或者生吞活剝，消化不了，結果理論是理論，自己是自己，一些不發生關係，換一句話說，就是不能把馬列主義的理論和革命的具體實踐聯繫起來，這樣的學習是沒有用處的，不過是一種洋教條主義罷了。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本身要求變革世界的實踐。馬克思和恩格斯曾不止一次的說：「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列寧也說：

「他們會很公平的譏笑那些背誦和簡單重複「公式」的行爲，因為這種「公式」最多只能指出一般的任務，而這些任務是必需依歷史進程中每個特殊時期底具體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環境而改變其形態的……。必需領會那不容置辯的真理，就是馬克思主義者，應當估計到活的生活，估計到實際中的確定的事實，而不是繼續拘守昨天的理論。」（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

斯達林也在「論列寧」一文中說：

「馬克思主義者有兩種，兩者都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活動，兩者都以「真的」馬克思主義者自任。雖然這樣說，兩者決不是同一的。不，兩者中間有着不可逾越的鴻溝！因為他們的活動方法是完全相反的。第一種的馬克思主義者是滿足於普通的馬克思主義的表面承認，只在口頭上宣傳着牠。他們不能也不願滲透進馬克思主義的本質裏，不能也不願把牠實現到生活上。把馬克思主義的活生生的革命的命題，變成僵死的沒有任何作用的公式。他們不把活動的基礎放在經濟或實踐鬥爭的教訓上，卻放在馬克思的引用上。他們不從活生生的現實的分析裏引伸出他們的命題及指令，卻從類推及歷史的比較裏引伸出來。言行的不一致——就是這一夥人的根本缺陷……和這相反的第二種馬克思主義者，卻把問題的中心從馬克思主義的表面承認移到生活的推動和生活的變革上。他們所注意的，就是要適應事勢，把實現馬克思主義的手段和方法指示出來；事勢若有變化，他們就準備把這手段和方法加以變更。……只有這一種馬克思主義者，纔能夠和馬克思所說的話完全一致，這種馬克思主義者的能力是決不以說明世界為滿足，卻要進一步去改變世界。這一種馬克思主義者的名字，就是布爾什維克主義(Bolshevism)，共產主義(Communism)。」

毛澤東在「整頓學風黨風文風」一文中說：

「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向客觀實際得到了證明的理

論，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稱得起我們所講的理論。斯達林曾經講過，脫離實際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空洞的理論是沒有用的，不正確的，應該拋棄的，好談這種空洞理論的人，應該伸出一個指頭來向他刮臉皮。馬克思主義是從客觀實際產生出來又向客觀實際獲得了證明的最正確的最科學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許多讀馬列主義的人，卻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條，這樣就阻礙了理論的發展，害了自己，又害了同志。」

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起來的思想，就是毛澤東思想，這種思想是完全正確的，適合目前中國的革命環境需要的，它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的中國化，民族化。每個青年人都必須學習馬列主義的理論和毛澤東思想，應用這種理論和思想來指導我們的一切鬥爭，應用這種理論和思想來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又從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中，來證明這種理論和思想的正確。

我們的學習是多方面的，要從書本中學習生產鬥爭的知識和階級鬥爭的知識，要在實際生活中向人民大眾學習他們的生產技術和生活經驗，並把書本知識和實際知識聯繫起來，應該採取怎樣的學習方法呢？

從來的學習方法總不外兩種：一種是自學，還有一種是集體學習。我們的學習應該以自學為主，同時注重集體學習。除了生產鬥爭的知識，亦即自然科學的知識，如算學、理化、三角、幾

何等課程非有先生口授講解不可，此外階級鬥爭，民族鬥爭的知識，亦即社會科學的知識，如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思想等課程，都是可以自學的，並且都要以自學為主。歷來由自學成功的人物很多，而且自學沒有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可以養成一種隨時隨地隨事都留心學習的精神。

除了自學以外，我們當然還要注意集體學習，集體討論，建立許多學習小組，學習單位。在學習開始的時候，盡量想出許多方法，展開學習，指導學習，在學習結束的時候，檢查學習，總結學習。而且還要把工作和學習聯繫起來，在總結學習的時候，也檢查工作。這裏把何勉先生的「北平同學是怎樣學習的」一文照抄如下，以作集體學習經驗的介紹。

「要學習得好，自然需要有良好的學習方法，這裏不妨談談我所知道的關於北方同學集體學習的一些經驗。

北平解放了不久，同學們的學習情緒也普遍高漲，他們積極響應了共產黨的號召，掀起學習的熱潮，在各校中常常看到五個六個以至十個人，湊在一塊兒，在學生會的統一領導下，組成了許多學習小組。

北平的同學也常常碰到會場嚴肅，大家發言的困難，而且要打破這一難關，的確是費力氣的事情，學習材料確定出來了，每個人也仔細讀過，並且還做了筆記，但是在有些學習小組開會的時候，發言往往集中在幾個人身上，其他人就一言不發，似聽非聽的坐在那兒，這是一種情形。

還有一種：就正如北平青訓班同志所反映的，大家努力拿起領導上擬好的討論提綱，「從書本上去找答案，「通過」書上的解答，沒有個別意見，大家背書一樣背了一下就算結束。因之使討論就無法展開，大家感覺還不如自己去看書，倒可以多看幾頁。

所以，有的便由於這些失敗的教訓而檢討出：因為在討論會以前，因未作一番充分醞釀啓發的工作，思想沒有開展，怎麼能討論出東西？同時，採用自上而下，只根據少數主觀見解擬定的提綱，不見得就會是大家所疑惑的問題，反而會使大家陷於被動，箝制了思想的開展。

於是，這就說明了在學習過程中，要醞釀啓發，發揮自由思想，自由提出問題，是打開學習討論的鑰匙。

在這裏，值得介紹的是北方一所著名革命大學——華北大學的政治訓練班集體學習的經驗：他們每門課程都差不多是用集體學習的方式來進行的，當一課程開始學習的時候，便有一個教員作一篇「引言」報告，告訴大家為什麼要學這個課程，在學習時應該注意那幾個中心內容，以作為指南；而在開始討論以前，為了能有充分的醞釀啓發，發揮自由思想，常常先進行了互助與漫談兩個步驟：

在那裏，你常常可看見三四個人坐在一起共同研究着一本書，談論着問題，這個便是他們的「互助小組」，由一個學習小組劃分為幾個互助組，這裏面，文化政治水平的高低分配得很平

均，先一塊兒逐字逐句精讀學習材料，然後以漫談或問答的方式來抓全篇的基本內容，中心要點，程度高的耐心幫助低的，你說一點，我說一點，在互相啓發下容易就把握住全篇的中心和要點，補足了在個人閱讀時所忽略的或沒有看清楚的地方，瞭解了通篇大意，而許多枝節或名辭上的小問題，也往往在此獲得解決。

互助之後，便進入漫談，漫談着重啓發，討論着重爭執，所以它是討論前的準備階段。

漫談要不拘泥於形式，不受束縛，才能談得開，談得好。因此，他們有時是在全組漫談，有時也在互助小組中進行，開會時，沒有一定主席，也無一定提綱，目的是不要受限制，能盡所欲言，於是在漫談中，由於大家的互助了解，互相啓發，互相補充，而時常會從幾個有關聯的小問題中，發掘出大問題來。

在北平，有幾個學校同樣也採用了這個方法，結果同學都說：「在漫談中每個人都有話說，每個人都敢說了。」

漫談之後，領導學習的同志把談出的許多問題搜集起來，加以綜合比較便訂出了討論提綱，而這提綱上的問題，往往是打中了同學疑惑爭執的中心。

討論前，同學都忙着找參考資料，反覆思考，而領導上更要求大家作出自己的發言提綱，以便思想更有系統。討論會開始了，時常雙方形成爲對壘的形勢，爭得面紅耳赤，自然有時一開頭

不免來一個冷場，那麼小組長便不妨事先組織幾個打頭砲的砲手，砲打響了，討論也就會展開。

領導討論是須有領導的藝術的，根據一個多年作教育工作的夏征農同志的經驗，有幾點必須掌握：一、先讓不正確意見發展，先讓歪論佔上風，然後慢慢扭轉過來，不要形成一面倒。二、小組長必須善於從各個意見中找出不同論點，組織力量，引起爭論。三、小組長不要早做結論，也不可使自己陷入論戰之中，不能自拔，而忘了領導，總結說來，就是要組織力量與發揚民主的問題。

至於對每個組員的要求呢？則是大家都要靜心聽，能記筆記的記筆記，否則會互不關心，各說各套，毫無結論。

當在大多數的眼光中，誰是誰非已經分明時，就可作出結論了，但是有時還得不到解決，在華大，就擴大全班或聯組大討論，以組織更多的意見來爭執，問題便愈爭愈明。

經過這樣的步驟和方法，事實證明，大家討論是會深刻而熱烈，學習情緒往往會提得更高。

在學習小組裏討論的時候，往往有同學提出來許多名詞要求解釋，結果造成會上專在解釋名詞，其餘都來不及討論的現象。根據北平同學的經驗，最好小組長事先向同學搜集這些問題，然後在壁報上，或者佈告版上開一個「名詞解答欄」來解釋，這樣不但解決一個小組裏的同學的問題，所有參加學習的都能得到幫助。

——「給解放了的中國青年」

集體學習的新方法

棲東第五期縣學，在二百五十餘名小學教員中，大部份是新提拔的教員，和準備教學的高小畢業生，僅有少數文化，政治水平較高的教員分配在各組內做學習的骨幹。

起初，由於領導上只了解「一個人讀，大家討論」的模糊觀念，缺乏細緻，周密的指導，致使學習過程中發現了不少的弊端，如讀者讀得太快，或太簡略，或分析得太草率，大家的印象不深刻，過時即忘，或討論問題與幾個程度較高的和發言積極的所包辦，大家的腦子裏像一盆漿糊似的，做了俘虜，還有的愛面子，好人主義，在討論當中只是簡談意見（如有人認為目前形勢是內戰，有人認為是和平）究竟誰是誰非，誰也不肯爭論，在寫筆記時，有的做了「抄報大王」有的就「我淨照着別人的抄，嚮午頭連覺也不睡，抄下來也不懂！」……

經過十幾天的研究討論和反覆的實驗，才從摸索中找到了這樣的一個學習方法——五段學習法。剛佈置到組裏，有的組長認為「這是一般的方法，我們早已用過了！」不肯虛心執行，結果做了尾巴；而堅決，徹底認真的照着這個方法做了的，學員們的情緒確是提高了，收穫顯著。為拋磚引玉，特地介紹出來供同志們做參考：

一、讀和分析

把文件的一個段落先讀一遍，讀得要乾脆瞭亮；再回頭詳細的分析的一遍（講一遍）。意義要講明，詞語要弄清。讀者應抱循循善誘的態度，以便聽者明白為原則。

一個學員這樣說過：「唸的時候不起甚麼作用，就等得分析！」所以，讀者必須有相當文化程度和政治質量，他對於學習的勝利與否，起着決定的作用，必須在小組內選擇之，切忌隨便指定或放任推諉！

二、討論問題

要提出的問題，是需要在聽讀時隨筆記下來的，當然記憶力好不用筆記，或者用一兩個字代替也可以，這可以避免在讀時，因為一個字眼或一個疑問而引起爭執，滑脫了中心。

在各階段中，掌握討論者（讀者），必須緊緊的掌握住：尖銳的指出發言者的不同意見，啓發鬥爭，通過熱烈的辯論，把謬誤的意見服從於正確的意見，使大家的認識更提高一步。

在討論中，又須要求每人表示立場；應顧及大家發言的機會普遍。經過這一階段之後；意義和詞語是應該做到完全明瞭的。

三、解答問題

在一個小組裏面，有不肯用心聽的，有不肯用腦想的。有了解得片面的，甚至還有把意義弄

翻了的，所以必須經過這樣一個階段，才能求得把問題了解得更進一步的深刻和統一。

發問題時，領導學習者（讀者）宜指定不用心聽和文化水平較低的同志們解答，如果他不會，可讓別人幫助解答（客觀上是把這個問題交給大家討論），又，學員之間也應該互相關心提問題。

四、談體會

一個學員對這一階段這樣的反映道：「大家把體會合在一塊起作用最大，這樣真滋味！」

當學習車相鱗的模範事蹟的第六段……他時刻關心到每一戶人家和每一個人的生活……，「有的同志這樣體會：「人家在敵區怎麼危險，人家都去堅持工作，叫咱，高低也不能行！」又有同志體會：「他把鬻糧都救濟了老百姓，自己連生產分的紅兩千多元都不要了，救濟窮人！咱們應該向他看齊！」……大家把體會交流完了以後，情緒就像有一個學員反映的那樣：「心裏真亮堂，好像開開了兩扇門！」

五、寫筆記

如果以上四個部階段的工作都搞好了，那麼這一個階段就不至作「抄報大王」或「抄下來也不懂」了，這裏可能記下來的，一定是本人所深造領會到的，一定是他主觀上認為應當記的。那上邊可以是個人的反省，可以是內容大意，可以是詞和語……。

寫完了，還需要找出幾個同志唸給大家聽聽，如有一個同志曾把學習車相鱗組織民兵那一段

事蹟所寫下來的筆記這樣的唸道：「……他首先抓緊了兩個積極分子，加強了教育，教育的內容是以基本羣衆翻身爲主，得到基本羣衆的信仰，初步組織了自己灰色的民兵……。」在另一行上，還寫了這樣一行：「灰色民兵——是民兵怕敵人捉去，不敢公開！」

——經過以上五個階段，文件的一個段落就算學習完了。接着就應開始另一個段落的學習。

+

+

+

(一) 這個學習方法是通過各階段不同形式，反覆的學習着同一內容，在教育心理學上講，它是掌握了：刺激反應的次數多而又是愉快的，那麼感應就會越牢固。

(二) 初運用需要耐心，不嫌麻煩，時間亦要長些，但運用熟練了，它比漫無標準的學習方法在時間上也不見得浪費。

(三) 這種學習方法運用於高小學生、村幹部、初中學生比較適宜。

(四) 乍看這是一般化的方法，但耐心執行卻能起其不一般化的作用。

——「社會教育的組織領導和方法」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由於剝削階級的影響，由於工人階級成分的複雜，還由於今天我們黨內成分的複雜，所以就產生我們黨內各個黨員間思想意識的差別，觀點、習慣、嗜好和情緒的差別；產生各個黨員間在某種程度上不同的人生觀、世界觀和道德觀；而且也產生各個黨員間對於事物、對於革命中的各種問題之不同的認識方法與思想方法。——有一些人，是正確的、客觀的從事物之發展的、聯繫的狀態上去看事物；而另外一些人，就是不正確的、主觀的從事物之靜止的、孤立的狀態上去看事物，或者只看見或誇大事物之這一方面，或者只看見或誇大事物之那一方面。總之，這另外一些人都不符合客觀事物之發展與聯系的規律去全面的看問題，而是片面的主觀的去看問題。——因此，就產生各個黨員不同的活動方法，就引起黨內許多分歧的意見、不同的主張與爭論等，就引起黨內的鬥爭。特別在革命的轉變關頭，在革命鬥爭每一次加緊與困難增加的情況之下，在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思想的影響和推動之下，這種分歧與爭論也就必然要更加激烈起來。

所以問題的中心，不在於黨內有無不同的思想意識，有無意見上的分歧，這是一定有的。問

題的中心，是在於如何解決黨內的矛盾，如何跑出這種分歧，如何克服黨內各種不正確的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當然，這祇有黨內鬥爭，才能解決這種矛盾，征服這種分歧和克服各種不正確的思想、意識。正如恩格斯所說：「在任何時候，沒有誰可以把矛盾長長掩蔽起來，矛盾須由鬥爭來解決。」

對於我們黨內各種錯誤與缺點及不好的東西，在黨內外有幾種不同的人，存在着幾種不同的看法和幾種不同的態度。

第一種人，他們不看見或者不願看見黨內這些缺點、錯誤及不好的東西，而盲目的樂觀着，自以為我們黨內什麼都好；因此，也就鬆懈他們的警覺性，放鬆他們對於這些缺點、錯誤及一切不好東西的鬥爭。第二種人，就只看見或差不多只看見這些缺點、錯誤及不好的東西，而看不見黨的光明，以為黨內什麼都不好；因此，而悲觀失望，喪失他們對於黨的前途的信心，或者在看見這些東西之後，大驚小怪，以為這將「了不起」，而使自己慌亂起來。這兩種看法，都是不正確的、片面的。至於我們的看法，與前兩種人都不同。我們一方面看到我們的黨是中國最前進的、最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政黨；另一方面，又清楚看到在我們黨內還存在着各種大小不一的缺點與錯誤及一切不好的東西；同時我們還清楚了解這些東西的來源及糾正與逐漸肅清它們的方法，而加強自己的努力與工作，進行必要的鬥爭，推動我們的黨和革命前進。

由於各人的立場不同與看法不同，對於我們黨內這些不好的東西，也就有幾種不同的態度。第一種態度，這就是高興我們黨內有這些缺點、錯誤和不好的東西，幸災樂禍，並想一切方法利用與擴大這些錯誤、缺點及不好的東西，（有時是採取反對某種錯誤擁護黨的路線之形式，而把錯誤弄到另一方面去）來達到破壞我們黨的目的。這是黨外敵對我們黨的人們及黨內暗藏的奸細與托派分子所採取的。

第二種態度，這就是同情、接受並學習黨內某些錯誤的思想及壞的樣子，以滿足他私人的某些企圖與慾望。他認為黨內某些缺點、錯誤的存在對於他是有利的，因此，他也自覺與不自覺的助長某些缺點、錯誤的發展而加以利用。這是黨內的投機分子及品質極不好的黨員所採取的。

第三種態度，這就是自由放任黨內這些錯誤、缺點及各種壞的現象不管，而任其自流的發展，他得過且過，而不願和這些東西進行鬥爭。或者他懼怕黨內鬥爭和自我批評，認為這是對黨有害無益的，或者是麻木不仁的不願看見這些現象，或者是對這些現象敷衍了事，採取調和的折中的態度。這是對黨責任心薄弱的黨員，及有濃厚自由主義思想與犯官僚主義錯誤的黨員所採取的。

第四種態度，這就是對黨內這些錯誤、缺點及某些思想不正確的人抱着「深惡痛絕」的態度。隨便的宣告和他們絕交，企圖一下子就把他們從黨內肅清，驅逐他們出黨。但如果一下不能

把他們肅清，或者還碰了釘子的時候，就表示沒有了辦法，悲觀失望，傷感起來；或者「潔身自好」，不管他們，或者自己遠遠的離開了黨。這種絕對的態度，還表現在對於黨內鬥爭與自我批評的機械的了解，他們以為在黨內同志中鬥爭得愈兇就愈好，把什麼小事都提到所謂「原則的高度」，對什麼小缺點也加上政治上的機會主義等大帽子，濫用組織手段甚至黨外的鬥爭手段來處罰同志；他們不按客觀需要及客觀事物發展的規律來適當的具體的進行黨內鬥爭，而機械的、主觀的、極其橫暴的、不顧一切的來「鬥爭」。他們認為無論在什麼條件下都要開展黨內鬥爭，而且鬥爭得愈多愈兇就愈好，以至發展到故意在黨內搜索「鬥爭的對象」。故意製造黨內鬥爭，並使黨的工作的推進，依靠在這種機械的所謂「鬥爭」上面。這是不了解黨內矛盾的根源的黨員，缺少辦法對付黨內分歧的黨員和機械了解黨內鬥爭的黨員所採取的。

第五種態度，這就是我們所應當採取的態度，和上述四種態度相反。（一）我們首先認識與辨別黨內各種現象，各種思想、意識，各種分歧的意見與主張，那些是正確的，對黨與革命的長遠利益是有益的，而那些又是不正確的，對黨與革命的長遠利益是有害的？或者在爭論的兩方面都是不對的，對的應該是第三種意見與主張。經過冷靜的辨識與思考之後，決定自己明確的態度，而站在正確的方面。不盲從，不崇拜任何偶像。（二）學習、提倡並發揚黨內一切好的模範和正氣，贊助一切正確的主張和意見，不學一切壞樣子，不受一切不正確的思想、意識的影響。

(三)不採取自由主義，而與黨內各種原則錯誤的思想和主張，與黨內一切壞的現象進行不調和的鬥爭，去不斷克服這些錯誤與現象，不敷衍，不放任這些錯誤與現象的發展，使之損害黨的利益，也不畏懼這種黨內鬥爭。(四)但是不抱機械的絕對的態度，在原則上的不調和與明確性和鬥爭方法方式上的靈活性與忍耐說服的精神聯合起來，在長期鬥爭中去教育、批評、鍛鍊與改造那些有錯誤思想但不是不可救藥的同志。是具體的、適當的去進行黨內在各個時期各種原則問題上所必要的思想鬥爭，而不是主觀的、機械的、神經病似的在黨內亂鬥一陣，也不是有鬥爭的嗜好。(五)在黨內鬥爭中團結黨，提高黨的紀律和威信，對於黨內某些已經不可救藥的分子，給以組織上的制裁直至驅逐出黨，這樣來達到黨的健康與鞏固。這是黨內一切好的前進的黨員所採取的態度。在上述五種態度中，只有這第五種態度是正確的布爾塞維克的態度。

上述第一、第二種態度之不對，是很明白的。我們的敵人利用每一個我們的缺點與錯誤來進行破壞我們黨的工作，是不足奇怪的。我們除經常提高警覺性之外，應該在黨內每一次缺點和錯誤發生之時，儘可能減少給敵人利用的一些可能機會。這是每一個愛護我們黨的同志所應有的職責。如果我們黨員在黨內鬥爭中不顧及這一點，如果他只圖當時鬥爭的勝利，一時的痛快，甚至不拒絕壞分子的援助。而與壞分子結合，或者還假藉黨外的某種力量與援助來達到黨內鬥爭的某種目的，那末，他就在政治上，黨的紀律上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

我們的黨員，在黨內應該反映正確的思想，學習好的模範，而不正確的和壞的樣子就不應該學習，而且應該反對。但是在黨內竟還有某些同志除反映些正確的思想，學習好的模範而外，多少還要反映些不正確的思想與學些壞樣子。對於某些同志來說，似乎是學壞容易而學好難，這是值得我們嚴重注意的。這些同志當黨內有某種錯誤發生時，常時有意無意的要助長擴大這些錯誤，在黨內鬥爭中則常常站在錯誤的一方面，或者由於某種立場而站在優勢的一方面。對於這些同志如果不給以嚴重的刺激和鍛鍊，是很難有進步的。

至於第三種對黨內各種錯誤缺點及壞的現象抱自由主義、官僚主義態度的同志，當然也是極錯誤的，是完全非布爾塞維克的態度。我想，這對於你們馬列學院的學生是很明白的，因為在你們學過的「黨的建設」內有整個一章論到黨內自我批評與思想鬥爭的必要，列寧、斯大林在很多地方對於這個問題解釋得很清楚、很深刻，中國出版社出版的「論政黨」一書第四章第五章講得很多，你們可以去參考，所以我在這裏用不着多講。現在我所要指出的，就是在我們黨內抱這樣態度的同志的確還是不少，真正負責的、正式的、誠懇的進行自我批評，揭發黨內各種錯誤與缺點及一切壞的現象，而加以改正與清除，常常是表現得不够，特別由下而上的這種自我批評不够，在這一方面我們還必須大大加以發揚。然而，在黨內那種不負責任的、非正式的、怯懦的、對於這個人或那個人、對於這件事或那件事的批評與不滿，背地裏的議論與閒話，卻是不少。這

是黨內自由主義的兩種表現形態。這是表示某些同志在政治上的發展、革命鬥爭中的勇氣還不够，黨內民主的正確發揚還不够。某些同志不敢破除情面，怕引起別人的抱怨和對於自己的反批評，而寧願放任各種錯誤、缺點在黨內存在，採取「得過且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敷衍了事的态度，然而卻又在背地裏去議論人家，這對於黨是無益而有害的。因為這種不負責任的批評與議論，可以引起黨內無原則的糾紛與不團結的現象，可以給黨內暗藏的奸細分子、壞分子以機會來進行破壞黨的活動。而黨內的錯誤與缺點也絕不會因為這種不負責任的批評而得到改正。所以，在六中全會通過的黨規上就禁止這種不負責任的批評與議論，而提倡黨內負責的、正式的、對黨有益的自我批評。

黨內既有各種缺點和錯誤存在，既有各種不正確的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存在，而這些不正確的思想意識中之每一種都可以在某種時期發展成爲黨內某種傾向，產生黨內某些原則上的分歧，影響到黨的行動之一致。這種情形，如果不正確的發展黨內的自我批評，經常揭發與糾正各種錯誤和缺點，不克服各種不正確的思想意識，不進行黨內鬥爭來征服黨內的分歧，而採取折中的態度與「中間」路線，而得過且過，敷衍了事，那末，「就不能正確的教育黨，教育階級，教育羣衆。」（斯大林）。「我們就不能前進，就不能發展」；「我們就不復成爲無產階級的革命家，而一定陷於滅亡。」（列寧）「在原則問題上的『中間』路線，便是閉塞頭腦的『路線』，

抹煞分歧的「路線」，黨在思想上腐化下去的「路線」，黨在思想上死亡下去的「路線」。『中間』路線底政策，不是我們的政策，這是萎縮而日趨於腐化的政黨底政策。這一個政策不能不使黨變成空洞的官僚主義的機關，和木偶一般，起不了什麼作用，而且脫離工人羣衆。這個道路決不是我們的道路」。 (『斯大林選集』卷二，二一九頁)

所以，「以鬥爭來征服黨內的分歧，乃是我黨發展的規律」。『我們的黨是在征服黨內各種矛盾的過程中發展和鞏固起來的』 (『斯大林選集』卷二，二二二頁)。所以在這個問題上的自由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態度，是不對的，而必須發展自我批評，進行黨內鬥爭，來反對黨內一切壞的現象，征服黨內的分歧，才能使黨鞏固發展和前進。

在這個問題上的自由主義，還表現在另外一種現象上。就是當着黨內某種爭論已經發生的時候，許多同志把工作放着不做，而去整天整月的進行空洞的爭辯，或者任意的放縱起來，咒罵黨內一切，並且在這種爭辯中使黨內團結鬆懈，使我們的幹部解體，使黨的紀律削弱，使領導變為無能，使黨的威信破壞，把我們戰鬥的黨的組織與黨的機關變為爭辯的俱樂部。這種現象在過去我們黨的某些組織中是不只一次發生過的。這也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說：「這並不是自我批評，而是醜事」，「是污蔑工人階級」。這是異己的，反布爾塞維克的所謂「自我批評」。這與我們所主張的自我批評毫無相同之點。我們的自我批評之所以需要，不是爲的破壞黨的威信，破壞黨的

紀律，滅弱黨的領導，而是爲的提高黨的威信，鞏固黨的紀律，加強黨的領導。

至於第四種抱着絕對態度的同志，也是不對的。

這種態度，是上述第三種自由主義態度之反面。因爲他們不了解黨內這些不正確的思想意識有深厚的社會根源，絕不是一下子可以肅清的。黨內的同志在各種不同的時候，都可能多少不一的反映社會上一些不正確的思想、意識，只有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那樣的純潔堅定，那樣正確、敏感而深刻的去認識事物，才可以完全不受這些思想意識的影響。所以孫中山先生稱列寧爲「革命的聖人」，也就是這個道理。而我們要在工作中犯一些錯誤，也是每個同志不能免的。如果說，所有多少反映社會上非無產階級思想、意識的同志，所有犯錯誤的同志，但都是不可救藥的壞分子，都不要，都不能容納，都絕對的拒絕他們，或者肅清他們，那末，我們的黨就不能建設。這樣拒絕肅清的極端結果，可能使這種抱絕對態度的同志自己，也不能不從黨內肅清出去。因爲他也不是「革命的聖人」。他也不能不犯錯誤。如過去某些在「肅反」中犯錯誤的同志，就抱有這種絕對的態度。抱這種態度的同志，特別不了解共產主義事業路程中極大的艱苦工作，是要把人類改造成爲大公無私的共產社會的公民。如果他們了解了這一點的話，了解帶有各種弱點的人類都要使他們在長期鬥爭中鍛鍊、教育、改造成爲高等文明的共產主義者，那末，今天爲什麼他們不能夠教育與改造已經加入黨的帶有多少舊社會思想殘餘的黨員呢？自然，

改造與教育這些黨員，須要長時期的，耐煩的教育與鍛鍊工作，是很艱苦的工作。但是，如果這點小的艱苦工作都不願做，都畏難，那又還說什麼改造世界與人類呢！改造世界與人類的空前艱巨的工作，我們都下決心做，都不畏難，那末，現今世界上還有什麼艱苦工作可以使我們畏難的呢！具有共產主義的人生觀、世界觀的黨員，是大無畏的，是不怕一切艱難與困苦的，同時了解世界事物的進程是曲折的。所以，那些抱絕對態度的同志是還不了解共產主義事業的艱巨性與曲折性。他畏難，想走直路，想一下子就肅清一切不痛快的東西，一下就跳到他理想的世界去。那末，他要碰壁，是一定的。但及至他在壁上碰得頭破血流之後，他就悲觀失望，喪失他對於共產主義事業的前途與信心，這就暴露了他自己的非無產階級的思想的本質。可惜多少抱這種態度的同志在我們黨內還是不少！

黨內鬥爭之所以必要，是由於在黨的發展過程中及無產階級鬥爭過程中產生了黨內原則上的分歧；這時候，「祇有爲了擁護這個或那個原則而實行鬥爭，爲了確立這個或那個鬥爭目標來進行鬥爭，爲了選擇這一個或那一個達此目標的鬥爭方法而鬥爭」（「斯大林選集」卷二，二一九頁），才能征服這種分歧，解決這種矛盾，任何妥協都無濟於事，黨內鬥爭就是必要的，而並不是由於我們嗜好鬥爭，歡喜爭辯。這就是說，當着問題已經發展到原則的高度，非用鬥爭來解決不可的時候，我們應毫不躲避的進行黨內鬥爭，來解決這些問題，而並不是說我們在一切日常政

務問題上，在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上，所有一切不同的意見，均非小題大作，絕不妥協，板着面孔來進行黨內鬥爭不可。斯大林同志說：「在日常政務問題上，在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上，是可以而且應該與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作一切妥協的。」（同上）

當着黨內發生機會主義思想，存在原則上的分歧，那我們必須進行反對各種錯誤原則與機會主義的鬥爭，來加以克服；而不是說在黨內並無原則上的分歧與機會主義發生之時，主觀的硬要擴大同志間在某些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上之不同的意見，並把這當作「原則分歧」，硬要「搜捕」某些同志當作「機會主義者」來作為黨內鬥爭之射擊的「草人」；並且以為黨的工作，黨的發展，無產階級革命鬥爭之勝利，就靠對於這種「草人」的射擊之火力的強度，而得靈驗如神的開展。當然，這並不是什麼真正要鄭重其事的進行黨內鬥爭，而是對黨開着玩笑，把帶着極嚴重性質的黨內鬥爭當作兒戲來進行。

對於黨內某些犯了原則錯誤與機會主義思想的同志，當着他聽說服，不顧黨的批評，而堅持錯誤，剛復自用，頑固不化，抵抗黨的方針，或者採取兩面派態度的時候，應該給以刺激，公開批評，以至給以組織上的打擊和處分，都是必要的。但是如果這些犯錯誤的同志，並不堅持錯誤，經過討論說服之後，願意改正錯誤，放棄他原來的觀點，或者正在冷靜考慮他的錯誤，而與其他同志進行平心靜氣的討論之時，並不是也要給以打擊與處分。自我批評與黨內鬥爭，並不以

面孔板得愈兇就愈好，也不以處分同志愈多就愈好，而以真能教育黨，教育犯錯誤的同志，糾正錯誤，鞏固黨爲自己的最高目的。如果在和平的討論，說服與批評的方式之下，能夠達到這些目的，而不須要板着面孔爭得面紅耳赤，而不須要處分同志與打擊同志，如果這是可能的話，那當然是最好也沒有的。然而，我們在以前某種時期內，常常很難聽到黨內的一種公開的公論，說這種並沒有原則分歧的黨內和平與黨內團結是很好的，必要的。照某些似乎瘋癲的人來說，任何黨內和平，即使是在原則路線上一致的黨內和平，也是要不得的；而必須「平地風波」的來製造黨內鬥爭，才能算得「布爾塞維克」。當然，這並不是什麼「布爾塞維克」，而是近乎不可救藥的人和以「布爾塞維克」來投機的人才這樣。

同志們！這就是說，爲什麼上述四種態度都是不對的緣故。這就是說，我們要用怎樣的態度去對待黨內各種錯誤缺點和壞的現象的解答。本來，我們就是在反對黨內黨外各種黑暗東西的鬥爭中來改造世界與人類，同時也改造我們的黨和我們自己。黨內鬥爭，是黨外階級鬥爭的反映。黨是在黨外階級鬥爭中——在廣大羣衆革命鬥爭中來鍛鍊、發展與鞏固自己，同時，黨又在黨內鬥爭達到自己的鞏固與統一，而更有計劃的、正確的、有力的去領導廣大羣衆的革命鬥爭。所以，對於黨內各種錯誤、缺點及壞的現象，採取自由主義的態度，企圖抹煞黨的原則的分歧，躲避黨內鬥爭，掩蔽黨內矛盾。敷衍了事，是根本上不對的。是對敵人有利的；因爲它與階級鬥爭

發展的規律相反，與我們在鬥爭中改造世界與人類的觀點相反。所以使黨內鬥爭脫離黨外的階級鬥爭——脫離廣大羣衆的革命運動，而變爲空洞的清談，也是不對的；因爲，離開廣大羣衆的革命鬥爭，就不能鍛鍊、發展與鞏固黨。但是，如果把事情弄到另外一個極端去，對於一切有錯誤、缺點但不是不可救藥的同志，抱着絕對的態度，機械的去進行黨內鬥爭，主觀的去製造黨內鬥爭，也是不對的。因爲這也要毀損黨，給敵人以乘機攻擊我們的機會。這也是完全違背黨的發展之規律的。對於黨內犯錯誤的忠實的同志，不是一開始就和他們決絕，而應該抱着愛護與同情的態度去說服、教育與鍛鍊他們，不到十分必要的時候，不公開打擊他們，驅逐他們。當然，我們不能容許任何人來損害黨的利益，我們也必須預防投機分子、奸細、托派分子、兩面派分子，利用一切機會來損害黨的利益。

雖然，在我們的黨內今天還存在某些錯誤與缺點，還有某些個別的部分的壞的現象。但是，我們完全相信，在工人運動的發展中，在偉大的羣衆革命鬥爭中，是能夠而且一定要肅清這一切東西的。中國共產黨以往十餘年來鬥爭的歷史及他在各方面的偉大的進步，和世界各國工人運動發展的歷史，都使我們對於這一點完全的深信無疑。

黨內鬥爭，是整個革命鬥爭中不可缺少的必要的組成部分，因此，我們的同志，不獨是應有黨外鬥爭的鍛鍊與修養，而且應有黨內兩條戰線鬥爭的鍛鍊與修養。但是，這一點在我們不少的

同志中，還沒有真正深刻的體會到，還缺乏這一方面的鍛鍊與修養。這表現在黨內許多無原則的鬥爭中，表現在以下的事實中：即我們有些同志特別在部隊中工作較久的某些同志，當他們與黨外反革命鬥爭時，不論是如何的殘酷，如何的艱難困苦，受打擊、委曲與冤枉，他們是絕對不動搖、抱怨與傷心的。但是，當他們在黨內鬥爭中，他們就絲毫也受不起批評、打擊、委曲與冤枉，甚至連一句也受不起。或者是他多疑，以為別人的某些話是暗示着他的，爲了這些話，也可以抱怨，傷心至於極點。同志們！這種現象是不能不引起我們注意的。

一方面，我們應該說，這些同志一般都是很好的同志，因爲他堅決的和反革命鬥爭，他把自已的黨當作溫情滿懷的母親。當他在和反革命進行了各種艱難困苦的戰鬥之後，回到自己偉大母親的懷抱中，是應該受到各種鼓勵、安慰與愛撫的，而不應該再受到任何打擊、批評與委曲。他們的這種希望，也是應該有的。然而，有一點他們沒有估計到或者估計不足，這就是我們黨內還有各種錯誤、缺點，還有黨內鬥爭，每一個同志也必須經過這種鬥爭。在黨內鬥爭中受到各種正確的或不正確的批評、打擊，以至委屈和冤杜，是不可避免的，每一個黨員都是要經過的。這並不是黨的無情，而是黨在階級鬥爭中不能避免的現象。但是，這些同志沒有估計到這一點，所以一遇到這種現象，就覺得奇怪，就出乎意外的難過與傷心。

在這裏，我覺得一方面我們的同志要注重和其他的同志團結，要用誠懇坦白的態度對待同

志，不要隨便的用言語來傷害其他的同志，不要挖苦刻薄，尤其不要在別人的背後不負責任的去批評同志，除開十分頑固，堅持錯誤，在黨內作各種壞事的人以外，對一般同志的錯誤，應該清楚的、誠意的站在幫助與愛護同志的立場，當面勸告與批評。這是我們尤其是比較負責的同志應該注意的。應該記着中國一句古語：「利刀割體創猶合，惡語傷人恨不消」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們同志自己就應該經常有黨內鬥爭的準備，應該受得起打擊、批評，以至冤枉、誤會。尤其不要為別人一些不負責任的甚至不正確的批評與流言所刺激而衝動起來。除開同志間、組織上正式的相互批評以外，只要自己的思想行為正大，對於個人不負責任的誤會與批評，必要時可以申明與解釋一下，如果解釋不了，只好讓別人去說。也應該記着中國兩句古話：「誰人背後無人說，那個人前不說人？」「任從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因為世界上完全不被別人誤會的人是沒有的。我們一方面應受得起誤會，不牽入無原則的鬥爭，另一方面自己應經常警惕，檢點自己的思想行動。

這就是說，我們自己不要用言語隨便去傷害別的同志，但當別人用言語來傷害自己的時候，該受得起。

黨內無原則的糾紛，我們是在根本上反對的。黨也是在根本上禁止的。因為它「無原則」，對黨有害無益。因為它「無原則」，所以沒有多大「是、非、善、惡」可分，所以我們不要在無

原則鬥爭中去評判誰是誰非，去計較誰好誰歹，這是弄不清楚的。我們只有在根本上反對與禁止這種鬥爭，要求進行這種鬥爭的同志，無條件的停止這種鬥爭，回到原則問題上來。這是我們對無原則糾紛所採取的方針。但是，不管黨的禁止和我們的反對，黨內某些無原則糾紛仍然要發生的，或者在某些原則鬥爭中夾雜着許多無原則的問題又怎樣呢？或者這些無原則的糾紛特別要來光顧我，把我牽扯在內。又怎樣辦呢？那麼，我們還只有着重原則問題，而不要去着重無原則問題，還只有根據上述的方針嚴正對待這些無原則糾紛，始終站穩自己的原則立場，不被牽扯到無原則糾紛中去。不要人家來一個「不對」，我也還他一個「不對」。我應該始終站在「對」的方面，去反對人家的「不對」。這件事對於我們的某些同志來說，是很不容易作到的，所以，也必須有鍛鍊和修養。

總而言之，我們在思想意識上的修養，就是要我們在基本上鍛鍊成爲一個忠誠而純潔的前進的模範黨員和幹部。我們要：（一）從馬列主義的學習與革命的實踐中來建立自己的共產主義的人生觀、世界觀，建立自己的黨與階級的堅定立場；（二）根據共產主義的人生觀、世界觀與堅定的黨的立場，去檢查自己一切的思想行動，糾正一切不正確的思想，同時，以此去觀察問題觀察其他同志；（三）經常採取適當的方式與態度和黨內各種不正確的思想意識作鬥爭，特別是影響到當時革命鬥爭的各種思想；（四）在思想、言論、行動上嚴格的約束自己，主要是對於當時

革命鬥爭有關的政治思想、言語和行動上嚴格的立場與原則來約束，除開原則問題與重大的政治問題外，就不要過分嚴格，不要在小節地方去「吹毛求疵」。

同志們！黨員基本的思想意識的修養，簡單講來，就是這樣。

論自我批評

自我批評的口號，並不是一種臨時的曇花一現的東西。自我批評是一種特別的、布爾什維克的，用以提高黨員幹部及一般工人階級之革命意識的方法。馬克思就已經說過，自我批評乃是鞏固無產階級革命的方法。至於說到我們黨內的自我批評，那末，當布爾什維主義在我國產生時，在布爾什維主義一開始成爲工人運動中特別的革命派別時，就開始有自我批評了。大家都知道，列寧在一九〇四年春，當布爾什維主義還未成爲獨立政黨，還同孟什維克在統一的社會民主黨內工作時，就已經號召黨進行「自我批評，並無情揭露自己的短處」。列寧當時在「進一步，退兩步」一書中就這樣說：

「……他們（即馬克思主義底敵人，——斯大林註）看見我們內部的爭論，就幸災樂禍，洋洋得意；他們爲謀自己的方便，自然極力想斷章取義，摘引我這本專門談論我黨本身缺點小冊子中的個別章句。但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已久歷戰鬥，飽受風霜，決不會爲這區區針刺所驚動，卻能够不管這針刺而繼續自我批評的工作，無情揭露本身的缺點。（着重點是我加的——

斯大林註），這些缺點，一定和必然會因工人運動底發展而被克服的。讓這些敵人老爺們一試把他們「黨」的真實情況的圖畫，給我們看看吧，那怕就是稍微近似我黨第二次大會記錄那樣所給予的圖畫也罷！」（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一六一頁。）

因此有些同志以為自我批評是一個臨時的現象，是一種時髦的東西，如一切時髦貨物一樣，很快就會過時，這是完全不對的。其實，自我批評是布爾什維主義武庫中所絕對不可少的、經常使用的武器，是同布爾什維主義底本性、同布爾什維主義底革命精神不可分離地聯結着的一種武器。

人們有時說，自我批評，對於尚未執政而「無物可失」的黨是很好的東西，但是對於已經執政而受敵人包圍的黨是危險的和有害的，因為敵人可以利用該黨本身弱點的揭露來攻擊它。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恰恰相反，正因為布爾什維克黨已取得政權，正因為布爾什維克也會因我國建設勝利而自誇自大，正因為布爾什維克也許會看不見自己的弱點而助長敵人——正因為如此，所以自我批評在目前，在得到政權以後，就特別必要。自我批評之目的，是揭露和滅除我們的錯誤，我們的弱點。——自我批評在無產階級專政底條件下只會使布爾什維克主義易於同工人階級底敵人作鬥爭，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列寧在一九二〇年五月在自己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那本書上，關於布爾什維克取得政權以後的狀況底這種特點，寫道：

「……一個政黨對於本身錯誤所抱的態度，就是最重要和可靠的標準之一，以審查這個政黨的態度是否尊重其事和是否在事實上執行自己對於本階級和勞動羣衆的義務。公開承認錯誤，（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揭露這錯誤的原因，分析產生這錯誤之環境，仔細的討論改正這錯誤之方法——這便是尊重其事的政黨之標誌，這便是政黨之履行自己的義務，這便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於羣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〇〇頁）

一九二二年三月，列寧在我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所說的話，是千真萬確的。他說：

「……無產階級不怕承認它自己在革命中某些事情做得絕妙，而某些事情卻沒有做得成功。向來所有已陷於滅亡一切革命政黨，其所以陷於滅亡，是因為自誇自大，看不見自己力量何在，而且怕說自己的弱點。而我們卻不會滅亡，其所以不會滅亡，是因為我們並不怕說自己的弱點，而且學習怎樣消滅這些弱點。」（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六〇到二六一頁）

結論只有一個：如果不實行自我批評，就不能正確地教育黨，教育階級，教育羣衆，而如果

不是正確的教育黨，教育階級，教育羣衆，就不會有布爾什維主義。

.....

但是，爲要擴展自我批評，首先就須要把黨面前的許多障礙消除。所謂障礙就是：羣衆文化程度之落後，無產階級先鋒隊文化人材之缺乏，我們的辦事遲緩，「共產黨人誇大狂」以及其他等等。但是我們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如果不是最嚴重的障礙，也是最嚴重的障礙之一。我們黨的、國家的、職工會的、合作社以及其他的各種各樣的組織中，都有官僚主義分子。這些官僚主義分子專門利用我們的弱點及錯誤來生存，害怕羣衆批評，害怕羣衆監督如像害怕烈火一樣，妨礙我們展開自我批評，妨礙我們消除自己的弱點和錯誤。我們機關中的官僚主義，並不僅僅是辦事遲緩和官樣文章而已。官僚主義乃是資產階級影響我們機關的表現。列寧說得對：

「……我們應該明白，反官僚主義的鬥爭，是絕對必要的鬥爭，這個鬥爭也如反對小資產階級自發性的鬥爭任務一樣，是很複雜的。官僚主義在我們國家制度中已經成了大病，以致我們的黨綱也提到它，這是因爲官僚主義是與這種小資產階級自發性及其散漫性聯系着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二〇頁）。

因此，若是我們真想展開自我批評和消除我們建設事業方面的毛病，那就須要用更大的堅持性來進行反對我們各種組織中的官僚主義的鬥爭。

因此，我們必須用更大的堅持性來發動千百萬工農羣衆自下起來批評，自下起來監督，作為剷除官僚主義的主要武器。

列寧說得千真萬確，他說：

「……如果我們想進行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那我們就須吸引下層羣衆來參加這種鬥爭……」因為，「要不是吸引工農，那還有什麼辦法可以消除官僚主義呢？」（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五九五至四九六頁）

但是爲要「吸引」千百萬羣衆，就應該在工人階級一切羣衆組織之中，首先是在我黨內部，展開無產階級的民主。如果沒有這個條件，則自我批評就等於零，等於空話。

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隨便一種的自我批評。我們所需要的自我批評，必需要能提高工人階級的文化，能發展工人階級的戰鬥精神，能鞏固工人階級對於勝利的信念，能擴大它自己的力量，能幫助它成爲真正的國家主人翁。

有些人說，既然有了自我批評，那是用不着勞動紀律了，那就可以把工作放着不做而去談天說地了。這並不是自我批評，而是污蔑工人階級。自我批評之所以需要，並不是爲的破壞勞動紀律，是爲的鞏固勞動紀律，而是要使勞動紀律成爲自覺的，能够阻擋小資產階級放蕩性的紀律。

另外有些人說，既然有了自我批評，那是再用不着領導了，那就可以離開船舵而一切「聽其自然」。這並不是自我批評，而是恥辱。自我批評之所以需要，並不是爲的減弱領導，而是爲了加強領導，而是要把缺乏威信的紙上領導變爲真正有威信的有生命的領導。

但是還有另一種的「自我批評」，這種自我批評會破壞黨性，會破壞蘇維埃政權之威信，會削弱我們的建設工作，會瓦解我們的經濟幹部，會解除工人階級底武裝，會變成爲高喊什麼脫化的空談。不久以前，托洛茨基反對派正是叫我們去實行這一種「自我批評」。

不待說，黨所主張的自我批評是與這種「自我批評」毫無相同之點的。不待說，黨將以一切力量和一切手段去反對這種所謂「自我批評」的。

應該把這種異己的、反布爾什維克的所謂「自我批評」，和我們的、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嚴格分清，我們的、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是以加強黨性、鞏固蘇維埃政權，改善我們的建設工作，鞏固我們的經濟幹部，武裝工人階級等等爲目標的。

（斯大林：「反對把自我批評口號庸俗化」見「真理報」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同志們，這並不是說，我們黨裏就沒有缺點了。不，缺點是有的，而且是有嚴重的缺點，讓我來簡單說說這些缺點罷。

例如就拿黨組織對於經濟機關和其他各種組織的領導來說吧。這裏是否一切都很好呢？不是的，並不是一切都很好的。不僅是在各地方，而且在中央，我們都往往看見人們藉所謂私人感情來解決問題的現象。比如某個組織裏的上層領導者張三，犯了極重大錯誤，把事情弄壞了，但是李四卻不願意批評他，指摘他的錯誤，糾正他的錯誤，因為李四不願意同他「結怨」。犯了錯誤，弄壞了事，那有什麼要緊！我們誰個不犯錯誤呢？我——李四——今天寬恕了他，他——張三——明天就會寬恕我。因為那裏能擔保我自己不也會犯錯誤嗎？彼此客客氣氣，和和平平，豈不是好！寬容錯誤就會弄壞我們的大事嗎？不要緊！總可以過得去的。同志們，這就是我們有些負責工作人員底普遍論調。但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布爾什維克是批評全世界的，照馬克思底話說來，我們是翻天覆地的，如果我們為着某些同志底安寧而放棄我自我批評，那就只能葬送我們的偉大事業，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座中喊聲：「對啊！」鼓掌。）馬克思說，無產階級革命與其他一切革命不同之處，就是它自己批評自己的，它是藉自我批評而鞏固起來的。馬克思這個指示是很重要的。如果我們，無產階級革命底代表，閉着眼睛而不願看見我們的缺點，如果我們

按私人感情來解決問題，彼此隱瞞自己的錯誤，正好似把我黨皮膚上的瘡毒驅進我黨身體的內部去。那末，究竟誰來糾正這些錯誤和這些缺點呢？如果我們不把這種在解決最重要的建設問題時所常見的庸俗氣，顧私人情面的習氣，從我們自己的隊伍中消除掉，我們就不復成爲無產階級的革命家，而一定陷於滅亡。這難道還不明白嗎？我們如果不去誠懇地直爽地進行自我批評，不去誠懇地公開地糾正自己的錯誤，我們就堵塞了前進的道路，堵塞了改善我們事業的道路，堵塞了使我們的事業獲得新的勝利的道路，這一點。難道還不明白嗎？要知道我們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地前進的。不是的，同志們，在我們這裏，還有階級存在，還有國內的各種矛盾；在我們這裏，有過去的東西，有現在的東西，也有將來的東西，在他們中間存在着矛盾；所以我們還不能一帆風順地在生活浪潮中前進。我們是在鬥爭中，在矛盾底發展中，在克服這種矛盾，暴露和消滅這種矛盾過程中前進的。當階級還存在時，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說：好了，現在什麼都很好了。同志們，這種情形無論如何是不會有的。在我們的生活中，總是有什麼東西在那裏死亡；但是那些日趨死亡的東西，決不願意隨隨便便就死亡的，而是拚命想維持自己的生存，堅持他那已經腐朽的事業。在我們的生活中，總是有新的東西在生長着。而這些正在生長的新東西，決不是簡單地就生長的，而是大喊大叫地爭取他那生存的權利。（座中喊聲：「對啊！」鼓掌）新東西和舊東西之間的鬥爭，垂死者與新生者之間的鬥爭，這就是我們發展底基礎，我們如果不以布爾

什維克應有的精神，去誠懇地公開地指出我們工作中的一切缺點和錯誤，那就等於自絕前進的道路。但我們是想前進的。正因為我們是想前進，我們就應當把誠實的革命自我批評作為我們極重要的任務之一。沒有這種自我批評，我們就不能前進，沒有這種自我批評，我們就不能發展。但是恰巧在這一方面，我們的工作還不大好。而且，人們往往因為得到某些成功，便把一切缺點都忘記掉，反而怡然自得，以為可以高枕無憂了。有兩三次的大成功——就以為百事大吉了，再有兩三次的大成功，就洋洋自得而目空一切了。可是錯誤和缺點卻依然存在，於是有害的瘡毒便深入到我們黨的身體內部去。

（斯大林：「聯共（布）中央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見「大會速記錄」，一九二七年）

論工作的求實精神

革命胆略與求實精神，以及與達成規定目標的頑強性底結合，這就是布爾塞維克工作作風的基本特性。

俄國工人階級肩負過的世界歷史任務，要求了極大的鬥爭胆略。列寧說過：俄羅斯「需要特別勇敢的，歷史上偉大的，充滿無限熱誠的倡導性與真正革命階級的胆略」。

布爾塞維克黨人所固有的革命胆略，在為我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共產主義勝利建設之史年前例的革命鬥爭中，得到了表現，任何一個國家，除開我國外，都沒有在短期內有個這樣多或者幾乎這麼多的革命經驗，各種運動形式變化的迅速及其多種多樣性。

布爾塞維克黨人過去和現在都永遠賦予革命運動以廣大的革命胆略。「俄國人的革命胆略，是一種興奮力量，它能喚起思想，推動前進，破壞舊事物，開展前途，無此則任何運動都不可能前進一步」。（斯大林）。

革命的胆略與無根據的空想及馬尼洛夫精神是無絲毫共同之處的。它乃是基於嚴格的科學分析環境，分析階級力量對比，經濟和政治發展的水平，以及基於對客觀可能性的估計上面的。黨

的實際行動，應將革命的胆略與勝利鬥爭的藝術，以及與組織勝利的才能結合起來。革命的胆略跟求實精神，及與達成目標的頑強性底結合，就形成黨工作底列寧——斯大林作風。

求實精神——這是一種不屈不撓的力量，據斯大林的定義是：它「不知道與不承認感受障礙，它用自己實幹的頑強性來排除任何障礙，只要事情一經開始，雖然這是一件不大的事情，它就能够貫徹到底，如果沒有這種精神，則重要的建設工作就無意義」。

沒有求實精神，沒有實現偉大創造性任務之頑強的鬥爭，則革命的胆略就可能墜落到革命的詞句，墜落到違背列寧主義精神的革命空談。

理論與實踐，諾言與行動，決定與執行底互相結合——這是布爾塞維克領導作風的特性。求實精神不能容忍諾言與行動的分離。表現求實精神——這就是說善於鬥爭的頑強性，保證本身任務的完成。求實精神不能與實際的組織工作隔開，它乃是組織工作的靈魂。沒有這種工作，則領導會墜落到限於頒發指令，甚至最好的計劃，也不能實現，而依然成爲善良的願望而已。拿契加洛夫州黨委工作的情形看來，它很少關心組織工作，把自己的決議付諸實行。今年三月間召開過的州黨代表會議，就曾指出州委會工作中的重要缺點。但正如最後一次全會上所說的，直到現在爲止，州委會仍沒有克服自己工作的缺點，他還沒有根絕形式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而這當然就降低了工作的實際效果。

求實精神是和文牘官僚主義領導方式無絲毫姻緣的，它可以通過許多決議，但不關心組織這些決議的執行。

這招致什麼結果呢，拿這一個例子就可以看出。雅洛斯拉夫州委會關於加緊勞動設備部所屬各校政治教育工作的決議。這些決議都正確而且在付諸實現。但這些決議總是不能完成。為什麼呢？因為圍繞着這些決議，並沒有做過或者幾乎沒有做過任何實際業務的工作。

不以行動來保證的決議，祇能是美麗的言辭。而這種與進行實際業務工作脫節的言辭，甚且也會把很好的工作者變為祇能將新鮮事業淹沒在言詞大海裏的空談家。

最好的決議如果不是接着進行組織工作，如果它的重心不是放在保證決議的實行上面，它會成爲紙上談兵和不落實地。黨的領導機關，不僅應當給予工作的方向，指出缺點，並且也善於實際去修正這些缺點，求得工作成績。

用組織來保證規定任務的解決——這就是說首先要接觸人，接觸幹部工作。

任何事情的命運，結果還是由人，幹部，他們的實際工作決定的。因此，接觸幹部，依靠他們給予他們以實際的幫助，指導他們。——這是組織工作最重要的方面。某些工作人員破壞黨的領導原則，常常以行政方法的一套來代替這些原則，這些事實是不能容忍的。其所以如此，是因爲黨的工作者忘記了他們並不是行政人員，而是獨立活動的黨組織的領導者，他們有責任展開這

種能提高黨員羣衆積極性之組織工作的方式。

決議通過以後，黨委員會的責任，就是要使最廣大的黨積極份子，共產黨員和勞動羣衆都參加執行這一決議。黨委員會應當使負責執行決議使命的工作人員，明白他當前任務的實質，並應當使他們很好地懂得，用什麼方法才能最好地完成決議，應選取什麼最好的組織形式，才能擴大黨對羣衆的影響力，保證當前任務的解決。

動員廣大的勞動羣衆，組織人員，教育他們——這是黨工作最重要的內容。黨的和政治領導的力量，乃在於領導思想及其計劃，不是爲小部份人所專有，而是爲廣大羣衆所受領。黨的領導者應當成爲人的組織者，成爲工作熱力、倡導性、克服困難時頑強性的鼓舞者。

爲着用組織來保證其一任務之解決，要求善於組織執行決議的檢查。斯大林同志於強調檢查執行的意義時指出：我們百分之百的缺憾和破綻，都是由於缺乏正確提出檢查決議的執行。如果有了這種檢查，則上述缺憾相信是可以預防的。因此，不以此布爾塞維克工作作風的重要要求爲指針的工作人員，是該當受到裁判的。斯大林曾在社會主義工業工作第一次全蘇代表大會上，對這些人說述：「我們這些人往往這樣想道：領導者——這就是在紙上簽字，這是可悲的，但是這是事實」。

求實精神底最重要的要求，就是不論事情大小，堅強下去貫徹到底，不在困難面前止步，克

服一切困難。布爾塞維克黨人——這是永不向困難投降，而是與困難鬥爭的人。祇有不怕困難，敢於迎接困難的幹部才是好幹部。在與困難作鬥爭中，可以養成工作者最寶貴的品質——堅忍性與達成目標的頑強性。

沒有頑強性、堅忍性與不屈不撓的精神，則一事無成。祇有有明確的目標，達成目標的勇往精神，與掃除任何障礙的頑強性，才能有所成就。當然，必須力求使工作中少有缺點，少些失敗，但是如果存在時，也「不要因失敗而悲觀失望，而要一次再次的用不屈不撓和堅忍精神來繼續工作」（列寧）。

至於向困難訴苦，很少實際來做克復困難的工作人員是什麼一種人呢？這種工作人員，是很壞的組織者；他不是盡一切力量去克服困難，而是意志薄弱地停在困難面前，使事業中途而廢。

布爾塞維克的求實精神，是與事務主義無絲毫共同點的。後者為了一些當前的勝利，而忘記了我黨活動的方向、性質和前途。「健全的事務主義——斯大林同志說——是好事情，但是如果喪失了工作的前途，不將自己工作服從黨的路線，那麼它就會變得相反」。

閉塞在狹小經濟事務圈子上，站在黨政策的大問題以外，不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的工作者，是有墜落到政治上的庸人，墜落到對政治漠不關心的無前途的事務主義者之危險。事務主義者喪失前途，這是不關心理論之實際工作者可悲的命運。

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意義在於：它以明確的目標武裝實際工作者，指出達到這一目標的道路，樹立勝利的信心，鞏固達成目標的意志。不關心理論的實際工作者，是不可能對工作有信心的，是不可能對工作正確性之自覺的。「若果他們不研究列寧主義，如果他們不努力掌握列寧主義，如果他們不願意把自己的實際工作與必要的理論準備結合的話，他們就會感性地工作，在黑暗中摸索着工作——這就是這種實際工作者可悲的命運」。（斯大林）

列寧曾對於政治活動家必須有明確的世界觀，賦予極大的意義。斯大林同志向我們幹部提出堅持掌握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問題。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三七年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全會上說過，若干工作者當迷惑於其經濟成就時，甚至忘記了地上的一切：政治工作，羣衆的思想教育，國家的國際地位，資本主義的包圍等等。這些人成了無原則的事務主義者，喪失了布爾塞維克黨人的風格，感染了自滿自足和百事大吉的精神。

斯大林同志在談談——三月全會上，指出了與此危險鬥爭的道路和方法，號召黨幹部將經濟工作同黨、政工作結合起來。他特別大力提出掌握布爾塞維克主義，關於提高幹部思想、政治鍛鍊、及成爲完全成熟的馬——列主義者的問題。幹部之馬——列主義的鍛鍊，是求實精神變爲事務主義，變爲狹隘的無原則的實際主義之消毒劑。黨的工作者不僅應當成爲好的實際工作者，而且成爲有廣大革命前途，理解周圍事變政治意義的政治家。

爲着順利地實現國家當前的任務，我們的幹部——黨的、非黨的布爾塞維克，蘇維埃政權的和經濟的工作者，文化活動家——都應當浸透着布爾塞維克的思想，很好地分析黨的政治路線，以國家利益來對待任務，善於在實際活動中以馬——列主義學說爲指針。我們幹部的任務是使自已成爲在資本主義包圍面前的警覺者，善於辨別和分析敵人宣傳的「釣餌」，同任何在外國事物面前阿諛逢迎的表現作鬥爭，及培養蘇聯人對自己社會主義國家的自豪感。

馬克思——列寧的科學以政治智慧武裝幹部，教導他們要將高度的革命熱情與布爾塞維克建設者頑強的求實精神正確地結合起來。

沒有求實精神——這種列寧——斯大林作風最重要的特質，則任何重要的建設工作都是沒有意義的。黨工作者的職責，就是培養自己具有一切政治領導者所必需的品質，掌握列寧——斯大林的工作作風，這是爲共產主義勝利鬥爭中百戰百勝的武器。

（流水譯自一九四八年七月九日真理報）

論學與修養

著者：毛澤東等

編輯者：曹 達

出版者：大地社

經銷者：
福州路三八四號
中國圖書公司

定價：